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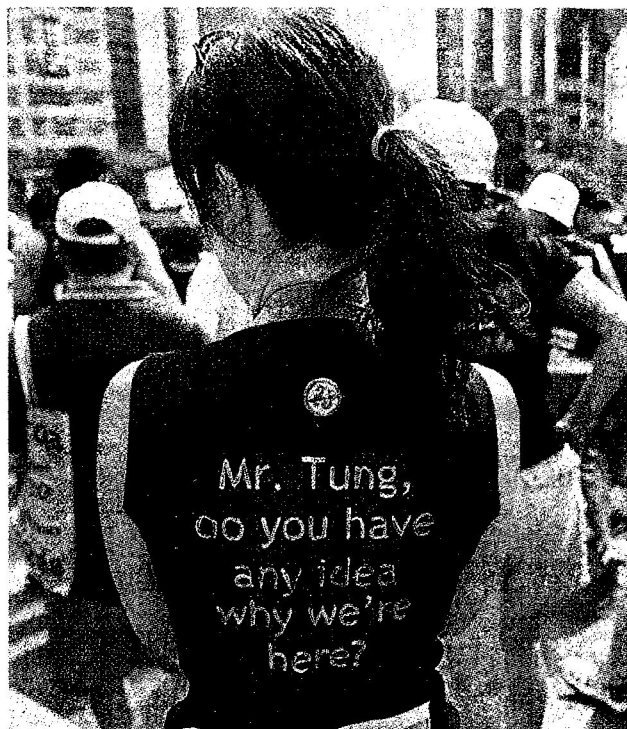
乘勝力爭普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員
胡錦濤的執政理念可經得起証驗
資本主義是否已在中國完全復辟

拉丁美洲特輯

拉美各國革命運動和左派的發展

乘勝力爭普選特首和全部立法會議員

振言



民憤民怨大爆發

7月1日，香港50萬市民上街遊行，高呼「反對23 還政於民」，成為89民運百萬港人上街後最大的遊行示威，以此表達對特區成立6年來施政失誤、強行訂立惡法剝奪市民權利的極度不滿和抗議。如果加上沿途熱烈響應的路人，和同樣不滿而未能參加的市民，肯定佔有全港人口的一個可觀比率。

這是香港民怨民憤的大爆發、大宣示；在這之前一個月的64大遊行，和隨後的燭光集會，參加人數都比前幾年大為增加，已顯露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奏。而在這個月內，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自恃穩可得到立法會內保皇黨派的多數票通過，尤其是自認為忠實執行京官限期今年中立法的指示而有強大靠山，於是演出強橫無理、氣焰囂張的惡行，完全漠視廣大民意、各民間團體、法律等專業界和立法會內民主派人士的不同意見，且不肯給予港人充分的諮詢討論時間，而限於短期內通過實施。她在許多公開場合、立法會內、電視機前的霸道十足表現，大大激怒了眼睛雪亮的廣大市民，以此成了最「好」的反面教員，推動更多的市民上街。市民們不顧烈日曝曬，有秩序地站立很久輪候出發，扶老攜幼前後歷時多個鐘頭，汗流濕衫，雖疲倦仍堅持，場面壯觀感人。隨後的7·9立法會外五萬人大集會，7·13二萬人的遮打道民主討論會，都提出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和全部立法會議員的正確訴求，顯現出港人爭取民主的努力方興未艾。

50萬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沒有被高估，即使一向慣於故意低報民間遊行人數、與實際相差一大截的警方統計，也承認有35萬人（還未計巨龍頭尾的人數）；從

維園一直綿延到灣仔區、中區的大道，都擠滿了人群；據也曾參加89年遊行的市民對記者說，他親感到這次大遊行的規模幾可及得上89年的。那麼大量的參加者中，許多在以前都對政治沒有興趣、不加過問的，但現在，他們太不滿於葉劉淑儀要強行立法的23條損害市民自由權利，不滿於她的橫蠻無理，囂張跋扈，更不滿於董建華6年施政的錯誤百出，導致絕大多數港人的權益遭到損害（包括被引導購入物業的負資產的中產階級，但除了他所維護的極少數大財團大資本家之外）。結果就一呼百應，累積的民間怨憤終於大爆發——齊齊上街宣示！

人民力量的勝利

這樣龐大的人民力量總動員，震撼了香港和內地當局（包括中共中央）以至世界，也大大出乎那些「擦鞋佬」的估計之外（例如，「首席顧問」劉「學者」估計有3萬人上街，自稱代表勞工權益實為文化打手的民建聯梁「議員」嘲諷民主派可把2萬報成10萬，諸如此類）。

而人民力量的巨大威力，更摧毀了7·9立法的美夢，在民建聯死硬支持當局如期在7月9日立法會審議通過23條之際，自由黨黨魁田北俊為了不願以後大量流失選票，實行「陣前倒戈」，單人上京，提出押後為23條立法，並辭去行政會議成員一職。這一突然轉軀，立即使形勢大變，董建華只得民建聯等少數保皇票支持，不能按如意算盤立即得到多數通過立法。

自由黨的急激轉軀，是50萬人上街的威力所迫成，也是人民發揮力量勝利的第一個明顯結果。另一個勝利結果是迫使23條草案押後，要以後再作公開諮詢和修訂。第3個結果是董建華更加孤立，主要只得民建聯的死硬支持，而民建聯則在這項政局變動中，在市民面前，暴露出其背棄市民利益的真面目。它的頭頭們在7·1大遊行前後都說，市民上街是由於受民主派的誤導，又不瞭解23條立法，以此貶低和侮辱龐大港人的智慧。北京官方英文《中國日報》也發表評論，指大遊行是民主派「脅持」民意顛覆特區政府的陰謀。其後，曾鈺成們雖然被迫而假意地向全港公開道歉，但他們的政治面目已為更多市民所看破，將不會盲目信任他們而在今、明年的選舉中再誤投他們的票。在最近的新選民登記中，年青人踴躍登記的人數，比以前增加很多，反映很多人的政治意識已大大提高，將以投票作為爭取民主的方法之一，這是他們從近期的政局變化中得到認識和啓示的。

普選特首的必要性

今天，備受市民憤恨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和以權謀私買車逃稅的財政司長梁錦松已在強大壓力下自動提出辭職，並已經被特首「接納」；但不孚眾望、頑固而諸多錯失的特首仍然在戀棧其權位，不肯像前述兩人那樣自動辭職，讓位給賢能。

其實，從7·1大遊行的事實，或者再從大遊行後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7月2至4日以電話成功訪問的結果中，都可顯示出民心之所向，董特首民望的急劇跌落。據上述對2200名市民的訪問所得，他們對特首的評分已由上月中的43·7分，大跌至35分的歷史新低，是該研究計劃主任近10多年來的民調中，錄得最低的中港台政治人物評分；而且，有逾7成受訪市民表示，若有權投票選特首，決不會投董建華一票。〈1〉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又在7月15至17日訪問了約900名市民，有6成不滿政府表現，比上月調查增加了7個百分點，是回歸以來最高的；表示滿意的則不足1成人；他們給董建華的評分為38·9分，較6月份跌了4·6分，是該所有紀錄以來最低的分數；他們對董能力的評價，有多項低於40分，其中的「促進民主發展」及「辦事能力」，分別為33·9分及34分。而且，據該所統籌員王家英自行分析，發現有近7成人給特首的評分是49分以下。王家英還說：現在「連民建聯、自由黨也對政制檢討有看法，政府沒理由不接波，不提出一些觀點。」〈2〉

而且，港大民研計劃和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所做的網上調查顯示，2萬6千多份問卷調查的評分，以100為滿分計算，溫家寶得63·2分，胡錦濤得58·8分，而董建華卻只得12·7分。〈3〉

上引的民調結果，可說是相當地代表了香港民間的普遍意見的。

在國內，民間對董建華的批評，可以北京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的文章為代表，香港的《大公報》以大篇幅加以刊出。該文指出：董建華在香港的「威望和可信性陷入空前危機狀態，乃至他的去留成了目前表面上的頭號焦點問題。」作者認為，政府目前要做的事，包括有「參照民願對特區政府進行審慎和適當的有限調整。」他提議「需要一位……主要各方比較信任的港人承擔較大的『副領導』的任務，以補董之不足。」並且，「要在多數香港大眾理解和認可的時候就《基本法》23條立法。」〈4〉

港人壓力的各種回響

關於普選首長問題，民建聯主席曾鈺成，為了力圖挽回已大大喪失了的民望，也含糊其詞地表示：「鑑於近期市民的訴求，中央同特區政府都要認真考慮在0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可行性。」〈5〉但為甚麼有可行性問題而不是考慮其必要性，又有甚麼不「可行」的問題呢？這顯然是模稜兩可的投機取巧表態，但也足以反映出民願之所在和壓力的強大。

翌日的《文匯報》，又登載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的有線電視訪問談話。他素被稱為「政壇教父」，政治意見立場一向保守，但今天也持有較合香港實情的看法，他表示：「香港現時的政制不是民主政制下的合理政制」（同日的《明報》則報道他說：「現時香港政制與民主政制背道而馳」），「行政長官由八百人的選舉團選出，相對立法會議員由數十萬選民選出，難以擁有聲譽和民望，對解決問題造成阻力。」他指出，「香港現正處於經濟困局，現時並沒有組織專門研究解決方法。」「經歷金融風

暴的東南亞國家已漸漸復甦，但香港至今仍未走出困境，九成工廠工人失業，他明確指出，政府要有心理準備，養他們一世。政府需有一班人明白整個政治經濟環境。」「香港現時在實施政策上存有很大的阻力，最主要的原因正是香港沒有施行民主制度。」〈6〉

今天，連一向很保守的「新界教父」、前鄉議局主席陳日新，也在一些重要港報刊登文告，首先引述董特首以前公開作出的「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承諾，在最後指出：「目睹耳聞50萬市民之訴求是直選。政府應作出『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的回應，以符合治港理念。」〈7〉

從以上所引各方面已發表的意見和各種事實可以說明，盡快立法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以取代不孚眾望的董建華，乃是港人非常普遍的訴求，也是特別必要和迫切的。同時，港人也清楚看到，立法會由不民主的產生辦法組成，保證了保皇派和保守派佔了多數，以致多年來所有有利於推進民主化的民主派或獨立的議員提議都遭到多票數無理否決。這證明由全港選民直選全部立法會議員也同普選行政長官一樣，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歷史要由人民創造

不過，在北京中央方面，又能否依從港人的願望呢？

去年11月新任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剛剛在《七一講話》中強調他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提倡「貴民、親民」理念。但在50萬港人上街清晰地表達其普選訴求之後，仍然堅持挺董，宣稱「香港的政治體制，必須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循序漸進地發展。」這等於表示，他不贊同在07年普選特首，盡快使香港政制民主化，而要一步步地慢慢「發展」。但他這主張並非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的，實際情況已清楚表現於50萬人上街示威，不滿董特首6年內的連串施政失誤，要求他同葉劉淑儀一樣必須下台，以便普選賢能，實現真正的港人民主治港。胡錦濤現在以「循序漸進」為擋箭牌，抗拒這一主流民意，與他所標榜的「順民意、謀民利」是完全言不符行的。

這樣的不順應民意，又怎「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擁護。」港人在七一上街之前，表面現象似乎7月9日由保皇黨通過保安局長的苛刻惡法已難以避免。但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英雄的港人結果以憤怒的洪流衝垮了葉劉的霸道地位，阻止了7·9立法的圖謀，打亂了京官限期實施的陣腳。這是又一次的新鮮歷史經驗：只要人民發揮出其潛在的偉大力量，歷史就不得統治者來指令寫成，而會由人民作主改寫。

由此又可得到啓示：祇要港人團結行動，再接再厲地努力爭取，則07年普選特首、08年全面改選立法會的普遍訴求是可以實現，眼前的一些艱難險阻是可克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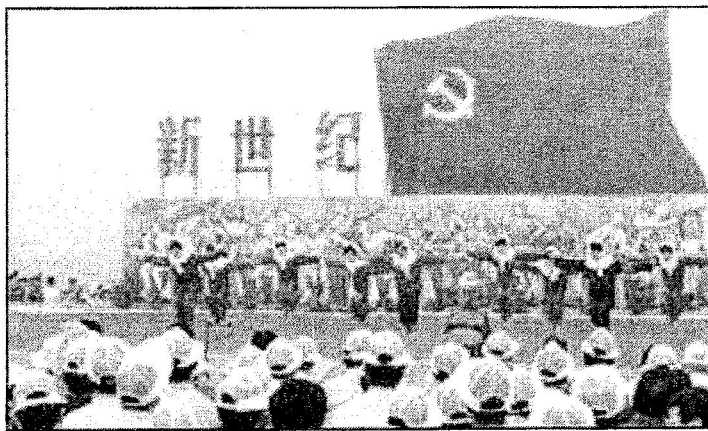
2003年7月23日

註釋：

〈1〉7月8日《蘋果日報》。〈2〉7月22日《明報》等港報。〈3〉7月25日《明報》。〈4〉引自7月16日《明報》的轉載報道上1日的《大公報》。〈5〉7月19日《文匯報》。〈6〉7月20日《文匯報》。〈7〉7月22日《明報》。

胡錦濤的執政理念可經得起證驗？

張開



標榜「貴民」「親民」

當中共成立82年周年之際，胡錦濤在中央有關部門聯合召開的《三個代表》理論研討會上，發表了一整版有多的長篇講話（以下簡稱《講話》）。這是他去年11月接任中共黨總書記以後公開發表出來的講話。本文現試圖從講話中找尋這一中共第四代領導人有無獨特的執政理念和主張。

他在冗長累贅地重複頌讚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餘，將「三個代表」思想闡釋為：「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集中全黨智慧，以馬克思主義的巨大理論勇氣進行理論創新，逐步形成。」這可以被視為：「三個代表」思想不是江澤民一個人在近幾年獨創，而是全黨逐步形成的。

他認為，「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是否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是判斷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終是最緊要的。」「只有順民意、謀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他指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持……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傾聽群眾呼聲，反映群眾意願，集中群眾智慧，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不斷讓人民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利

益。」而且，「要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對群眾生產生活面臨的這樣那樣的困難，特別是對下崗職工、農村貧困人口和城市貧困居民等困難群眾遇到的實際問題，一定要帶著深厚的感情幫助解決，切實把中央為他們脫貧解困的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

全篇《講話》，還有許許多多的美麗詞句包裝的理念主張提出，舉不勝舉。但這許多理念和許諾，到底怎樣去落實、實現呢？這是問題癥結之所在。

寄希望於黨政幹部

他寄托希望於各級幹部和政府切實落實中央的各項政策措施，但為甚麼他們一向沒有這樣地做到，而一經他號召就能夠完全改觀地做到呢？何況，中央的各項政策措施又是否可以為下崗職工、城鄉人民脫貧解困（特別是大量職工下崗失業和農民貧困化主要由於中共的方針政策造成以後）？

答案是否定的。各級幹部幾乎全部都優先看重自己的物質特權，並且為擁有它而不顧其他一切（包括他們以前或者也曾有過的理念）。《講話》要求領導幹部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解決好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問題」。這只是要他們從意識形態方面去改變自己的既得物質特權問題，卻不是從制度上取消他們的所有特權（包括政治特權），因而顯然是無效果的「勸導」，即使從思想方法上看也是唯心主義的。要徹底有效地使各級幹部和政府能真正解決城鄉人民的生活困難等問題，就必須做到中國政治民主化和中共黨內民主化，取消幹部所享有的政治上經濟上特權，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能夠當家作主，取代中共長期以來的一黨專政，從而得以徹底改變中共制定和實施的無數錯誤方針、政策、措施。

可是，胡錦濤的《講話》卻完全沒有提到黨內外的民主改革問題。據未經證實的《蘋果日

報》記者張華文章報道，胡錦濤在會前的徵求意見稿中，曾提出黨內民主化改革，且「有具體內容，可操作性甚高」；但受到黨內保守人物的猛烈抨擊，使胡作出讓步，把部份內容刪掉（見該報7月6、7、9日）的「解讀中國」欄《七一講話》系列）。如果這項報道屬實，那就又一次證明：中共黨內的官僚傳統保守勢力仍一直佔著壓倒性優勢；胡、溫等新「接班人」當上黨政高職，仍是有名少實的；他們即使要推行改革，也會遭到反對、阻止，情形多少像趙紫陽當年擬對學生要求讓步而遭到反對一樣（雖然胡、溫今天還不至於立即被拉下台來）。中共的官僚體制和各級幹部擁有政經特權，長期以來已經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不可能全黨上下一心地自我民主改革的。胡錦濤即使有心像胡耀邦、趙紫陽那樣進行改良，也不能超脫出現有制度和既得利益官僚的包圍力量，特立獨行地成功。今天的《講話》完全不提黨內民主化問題，就是一個新的明證。

不錯，胡錦濤在《講話》中，也和江澤民等差不多地批評說：「現在，有些黨員幹部思想空虛，意志衰退，抵禦不住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誘惑；有些地方和部門存在各種消極腐敗現象。」儘管他循慣例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而且只說是「有些」；但路人皆知這些是普遍地存在的。而即使是如此簡略的描述，也足以反映出，這些正是官僚體制和幹部享有特權的客觀現實的必然結果。

非典疫潮失誤，改革呼聲更高

為了維護官方體制及幹部特權不受侵犯，中國的媒體一直被官方操控；以致在非典型肺炎疫潮在穗、京大爆發時，全被封鎖消息，民間（特別是香港）不能及時獲知嚴重性而預防及醫治，導致醫務人員和平民大量染病甚至死亡。胡錦濤事後在講話中極度地稱讚黨中央「把防治工作列為各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採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書寫了中國人不畏艱險、敢於勝利的壯麗詩篇。」彷彿對勝利還會有敢不敢的問題也似的！但這在當時卻激起了國內外人民很大的反感，中央雖撤換了兩名負責高官作為交待，但民間卻響起了要求解除新聞封鎖控制的改革聲音。這迫使中共主管新聞文化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5月16日出版的《求是》上撰文提出，要增強宣傳思

想工作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5月29日的《文匯報》在全版的專題報道中，以「中國傳媒醞釀大變革」為大字標題，引述北京的消息認為，中國在新聞文化方面正醞釀重大的變革。而6月28日則報道，文化體制改革的調研工作已正式啟動，內容涉及思想宣傳、輿論引導等多項內容。

在此同時，許多中國的學者和社會人士已紛紛提出要各方面改革。例如，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最近一期《財經》雜誌上發表文章指出：這次非典危機實際上是一次社會治理的危機，它暴露了沿襲多年的政府處理危機事件的方式存在「極大的缺陷」；他呼籲政府在新疫情過後，要不失時機地推進政治和社會體制方面的改革，建設一個「公開、透明和可問責的服務型政府。」《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周瑞金也在同期雜誌中發表題為《推動訊息公開，媒體責任重大》一文，認為媒體應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積極主動去依法突破訊息封鎖，同無理的行政干預進行必要的抗爭。」（6月24日《東方日報》報道）

中共內部要求推行黨內民主的呼聲也持續出現。中共中央黨校屬下的《學習時報》7月7日報道，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胡錦濤的清華大學同學虞雲耀接受採訪時表示，沒有活力的黨不可能長期執政；增強黨的活力，必須發展黨內民主，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他呼籲，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為基礎，以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和黨的委員會制度為重點，從改革體制和機制入手，建立健全充份反映黨員和黨組織意願的黨內民主制度。要加強對黨的領導幹部的監督，健全黨內監督制度，並和法律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相結合。（見7月10日《蘋果日報》轉刊中新網報道）

單是上引這些最近略見於港報的報道，已反映出國內要求中共黨內外民主改革的呼聲是強烈而且較普遍的。由此造成的強大壓力，胡錦濤難道不感到而能夠完全不加理睬嗎？

胡錦濤的回應

他在《講話》中曾發出支票說：要「經過長時期的努力，不斷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儘管中國實際上全無民主，談不上是從比較健全走到「更加健全」，而且還要「經過長時期的努力」才會出現；但這如果顯現出

全是空頭支票，所倡言的親民、「貴民」理念全無行動落實，那就會很快失信於人民，為人民所唾棄，從而更加不能企圖借助於某種人民力量去抗禦黨內頑固保守勢力的壓力、攻擊，而只有更加依從後者的意旨去做，成為他們的傀儡。這會是他所願見到的嗎？

若果他多少傾聽現時各方面要求民主改革的呼聲，就必須採取一些實際行動去回應，以表現他的「貴民」「親民」不全部是假大空話。

然而，在他即將發表「貴民」講話的七一黨慶前夕，中共卻加強箝制傳媒的言論。繼前不久的一些箝制事例之後，北京傳出在一周內兩次禁制被指為「違規」的報刊。一次是針對北京《工人日報》旗下的《北京新報》，因刊登了題為《中國七大噁心》一文而被撤銷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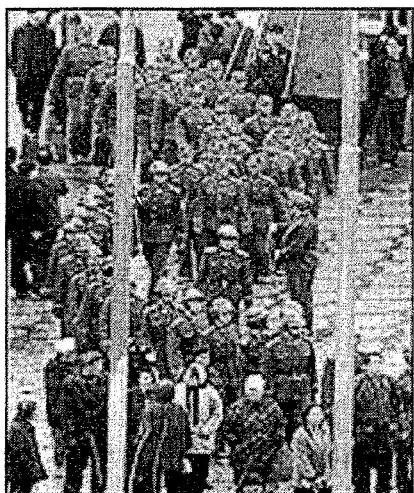
停止出版，編輯部被解散。該文被認為是「攻擊詆毀國家制度，侮辱權力機關，違反國家新聞出版規定。」該文對中國當前與過去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現況提出了相當嚴重的批評，重點包括批評高幹的發言永遠被視為金科玉律。另一次是禁制6月20日出版的《財經》雜誌公開發售，該一期除報道周正毅案件外，還刊登沙士危機的反思文章。（見6月25日《蘋果日報》）

這樣的壓制新聞出版自由依然繼續發生在胡錦濤出任黨總書記之後，在他發表七一講話之前不久，這對他聲言要使「民主更加健全」實在是一大掌摑。而來日方長，將有無數事實會證明他的《講話》能否經得起多少的考驗！

2003年7月15日

公安人員無法無天，導致法例更換

軍行



中國公安人員一直濫用權力，任意魚肉人民，對被拘留者非法地酷刑逼供或藉口斂財，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無辜受害的人民數不勝數，慘不忍言。今年3月和6月之間，官方新華社、湖南《三湘都市報》和《北京青年報》分別報道的有關新聞，就是無數事例中最新而駭人聽聞的幾宗。

一宗發生於廣州。武漢大學生孫志剛受聘於廣州一間時裝公司，因未帶任何證件，被公安帶回黃村派出所，次日晚被送往醫院，兩日

後因身體大面積創傷，休克死亡。事後，該派出所3名公安被刑事拘留。廣州傳媒曾經報道，當地警方曾送二千元給孫志剛家屬，但不為家屬接納。事件曝光後，終於由當局設立專案組調查，並且拘捕了當時同病房的8名病人和2名醫護人員。（5月14日《蘋果日報》轉引新華社報道）官方報道似乎意圖把毆打致死責任推在醫院11人身上，但看來孫是在送往醫院之前已被打到奄奄一息，那11人與孫並不認識且無仇怨，最多是在公安脅迫下替公安加上最後一擊的。但無論如何，主兇是公安，應是不爭的事實。

又據湖南《三湘都市報》報道：現年三十五歲的蕭大淵於今年三月因涉嫌盜竊，被株洲市荷塘公安分局刑偵大隊審查，公安將蕭的衣褲脫光，雙手反扣在一鐵椅上，用電棒對蕭的下體電擊七、八次，每次電擊約一分鐘。蕭大淵聲聲慘叫，在極度疼痛下陷入昏迷。公安一直不准蕭舉報投訴，直至被關一個多月後，因傷口潰爛不堪，疼痛難忍，需送院急救，才被當地檢察院發覺，揭發真相。（詳見7月22日《蘋果日報》）

另一宗出現於湖南。今年6月10日，湖

南《三湘都市報》以《滴血的收容》為題，報道了該省漣源市收容遣送站（以下簡稱收容站）通過給回扣（回佣）與派出所勾結「收容」外來人員，並向每個被收容者收取500元至800元遣送費後放人的內幕。消息來源是收容站原黨支部書記郭先禮，據他統計，從1996年到02年11月份為止，該收容所利用扣人索錢的手段，已經從一萬多農民身上獲取現金320萬元。其手段是：該站同市火車站口頭協議，火車站派出所和聯防隊員以收容三無人員名義，把經過漣源的農民扣下來，由收容站接去，每抓一農民，火車站派出所可得回扣50元，隊員得5元。「收容站抓來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些無辜的人」。身上有足夠錢的農民，留下錢後便可離開；不夠錢的，收容站就拍電報到他家裏，要求速帶800元來「自保」接人。家裏也沒有錢的，就要給站裏幹活，挑土、搞建設、做磚、種菜等等，卻無報酬。

這個報道透露，同樣情況在其他收容站（所）也存在：有關負責人「蕭笑華承認，他和外面很多收容所有聯繫，每拉過來一車被收容人員，漣源收容站要出的成本是2.2萬元錢。」「此前，被《三湘都市報》報道過的岳陽收容站不僅停止了收容工作，而且已經拆掉了舊的收容站。當地民政局的艾科長表示，收容所的基建工作確實『需要改善』」。（這裏婉轉地說的「基建工作」，即是指對待被收容人員的工作。）

郭先禮指出：「收容站的工作是兩套，向政府報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一套。政府覺得站長在一線工作，了解情況，也就聽站長的。」（以上報道全部引自《南方都市報》供稿的6月19日《北京青年報》）

但後來，正因為這種黑幕不祇存在於漣源市等極少數收容站，而且是“天下烏鴉一樣黑”地普遍存在於各地，又發生了孫志剛等慘劇並曝光了，這才引起國務院的關注，檢討1982年5月國務院發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所產生的弊害，那些抓人勒索的收容站人員，就是憑藉這條法例去「依法」行使其權力，實際上是「無法無天」、肆無忌憚地任意妄為的。而其根源則是擁有政治

上特殊權力（縱然是起碼的低級政府執法人員也擁有），不受群眾的批評、監督、彈劾、以至撤換。

在《三湘都市報》刊出了上述報道後的第8天，在溫家寶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審議並原則通過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草案）》，修改後在20日公布，8月1日起施行，同時廢止1982年5月發布的《收容遣送辦法》。《救助管理辦法》「要求，救助站不得向受助人員，其親屬或者所在單位收取費用，不得以任何借口組織受助人員從事生產勞動。……不得限制受助人員離開救助站。」「《辦法》還明確規定，救助站工作人員應當自覺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政策和有關規章制度，不准拘禁或者變相拘禁受助人員；不准打罵、體罰、虐待受助人員或者唆使他人打罵、體罰、虐待受助人員；不准敲詐、勒索、侵吞受助人員的財物；不准剋扣受助人員的生活供應品；不准扣壓受助人員的證件、申訴控告材料；不准使用受助人員擔任管理工作；不准使用受助人員為工作人員幹私活；不准調戲婦女。

違反這些規定構成犯罪的，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紀律處分。」（引自6月23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辦法》所說的「應當」、「不得」、「不准」，實際上就是已發生的不應該和不准許的情況，這些規定在以前的官方文件中大都應該已有列明。但問題正在於各級地方負責人員的「有法不依」、「知法犯法」、「陽奉陰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些引語都是中國官場一直流行的現象），甚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使得那些冠冕堂皇、面面俱圓的規定都變成了無用的條文。剛公布施行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中的「不應該」、「不得」和「不准」事項，將來也難避免不或多或少會有類似的結果，儘管它列有違反這些規定的追究責任條文。這是由於上面指出的政府工作人員任意妄為的根源依然存在的緣故。

2003年7月25日

資本主義是否已在中國完全復辟？

兆立譯

〔譯者按：以下兩文，一篇是譯自第四國際的國際執行委員會提交給世界大會討論、表決的決議草案《世界新局勢》中的一部份；另一篇則是第四國際的法國支部革命共產主義同盟對它的修正提議。前者認為中國仍處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但正向資本主義倒退；後者則認為資本主義已在中國復辟。聽說大會已採納前一意見。總題目為譯者所加。〕

中國的動力

——第四國際執委會的草案一部分

從列強的立場來看，中國繼續代表一個不確定的因素。這在地緣政治（已知的有台灣、西藏、新疆等問題）的平面上，和社會經濟的平面上都是一樣。美國、歐洲聯盟、特別是日本的統治集團都意識到，在任何局面下（除了分裂以外，不過很難設想這會發生，雖然有潛在的離心力量），中國將會努力地試圖在未來幾十年內扮演強國的角色，維護它在亞洲的支配權力。還有，它似乎也從科索沃戰爭得到教訓，儘量要將其軍事力量現代化。儘管中國仍保持官僚化過渡政權，它現在似乎對外國投資者提供了比俄國更多的保證。這就是為甚麼所有帝國主義大國都要利用中國的開放所帶來的投資機會。事實上，就它內部的動力而言，中國的社會已經經歷了大量的變化，尤其是在最近十年內。經濟已繼續以相當高的速度增長，只受到〔1997—98年〕亞洲危機很小的影響。與國家經濟以及／或者外國投資有關聯的資產階級層份已經成形。這個層份大部份是來自官僚層的各部份。

然而，經濟的增長率在二十世紀最後兩年有了明顯的放慢。官方消息的提供者已毫不躊躇地提到放慢的趨向，在這同時，佔了高百分比率的國有大企業，不顧過去及計劃中的重組，仍然停留在虧損狀態。除了比較多變的經濟情況以外，正變得愈加清楚的是，中國經濟漸增地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正在產生資本主義經濟的週期現象（例如部門的生產過剩和設備過剩、過度的競爭、消費價格的降低、建築物空置等等），多於產生具有官僚化過渡經濟特徵的現象。因此，對經濟情況的負面影響，正在變壞：大城市中漸增的失業和農村中仍然極高比率的所謂剩餘人口。

在統治圈子中，例如，當作出參加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決定的時候，對是否需要堅決向前推進新路線、或者放慢、或者甚至採取一些後退措施的問題，曾經有點遲疑不決（有一段時候，所謂保守的措施被宣佈了）。但是前一個選擇似乎是無可避免的。因此，最重要的決定和藍圖意味著對國有部門的持續限制，在這同時愈來愈多的私有公司正在所稱的集體企業中擴展業務。此外，還有更大量地引進合股公司的計劃，包括為了解決那些連年虧損的大公司問題的計劃。

考慮到這種行動計劃也以吸引工業、財政和商業方面的外國公司為目的，私人資本積累的機會要比上段時期大很多了。這樣一個前景，在更起勁地應用市場利潤的標準，和因參加世貿而逐漸降低關稅的準則下，就充滿了各種社會後果。各資產階級層份可能會更擴大、更強，而且中等階層的重要性日漸增加的時候，與後者一起增加財富。與之對照起來，各工人階級層份、農民的廣大部份以及人口中的貧苦部份就會因新路線的繼續發展而受到重大打擊。此外，在最近幾年中，社會矛盾已在農村及城市中變得日益常見。最後分析起來，這個政權的政治均衡可能會嚴重地受到動搖。

資本主義正在中國、越南復辟中

——法國革命共產主義同盟提案

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文件承認資本主義在前蘇聯復辟的現實，但是不認為已在中國復辟。它認為中國正“在變化中”。可是相反地，分析中國官僚層及帝國主義的各種政策，每件事情都說明，我們正面對著由官僚層自覺地組織的資本主義復辟過程。

自從1980年以來，中國官僚層已經建立了多個廣大經濟發展區，稱為經濟特區，以吸引外國投資，或在那裏成立公私合營企業。在華南及上海附近，較大的國家投資公司正在供應外國投資人們的公司所需的商品。許多新的工人階級正在集中地壯大起來，其居民大部份是從內地移居到那裏的工人，例如在廣州附近的經濟特區，在2300萬的居民中，700萬人是從內地來的移居者。與前蘇聯比較起來，中國的原材料資源沒有後者多，但是有用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供應。農民人口在中國佔大多數，在蘇聯卻已變成極少數。還有，中國農村的“市場經濟”改革已把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趕出土地，以致他們不計較工資多少也找工作做。

在1995年〔這個年份應為1985——譯者

註〕，資本主義在中國投資的總額是20億美元，現在已達到450億美元！在過去10年中，前蘇聯與中國之間投資額的比率每年都是一樣：中國比前蘇聯多20倍——這就顯示資本家們在作何種選擇。在西方的經濟報刊上，一篇又一篇的專欄文章談到中國模式的向資本主義的管理過渡（managed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即在管制下向資本主義的過渡——譯者〕時，它決不是亂講的。中國事實上是世界上第二個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

香港的平靜融入〔回歸——譯者註〕，它的股票市場在中國經濟中所扮演的較重要的角色，都證實復辟主義方案所走的方向。新成立的上海和廣州〔其實是深圳——譯者註〕股票交易所日益壯大，而且吸引到很多外國資本。大量的台灣資本也投資在大陸。中國剛剛加入世貿，而且從開始就接受對進口農產品徵收較低關稅的規定——以致印度變得非常神經緊張，因為多年來它一直為此事向世貿爭取。

官僚政權曾經保證人民得到最低限度的社會福利，但是在過去十年中，人民的這些收穫已被破壞了。（例如在教育方面，從小學到大學都已私營化，學生要繳交學費；在健康服務方面，其質量依收入的不同而有差別）。中共政權一向是很嚴厲地剝削它的勞動大軍的。曾經能夠去中國看到工人生活現狀的外國工會積極份子曾經報告，中國工人在礦場中或在國有工廠中的工作情況很像19世紀的資本主義。在2000年，中國有3萬5千名礦工在國有礦場中喪生，這是全世界開採每公噸礦物所造成的最高死亡率國家之一。對廉價的中國勞動大軍的剝削，是中共政權的“金礦”。它現在與在中國投資的外國資本聯合起來進行剝削，引進利潤標準，而且漠視安全條件。中國的安全條件變得更壞，是因為中國工人不能保衛他們自己。在向外國資本開放的深圳“經濟特區”，12200名工人在2000年受到嚴重的工傷。以前曾在泰國或南韓投資、要從它們的低工資中獲利的資本家們，現在卻在這些國家面對著強大工會運動的興起，因為在推翻了那些阻礙民主運動的軍事獨裁制以後，這些工會運動能夠通過罷工來獲得增加工資。所以這些資本家正把他們的工廠搬到中國或越南去，因為在這些地方工資比較低、工人階級被迫使保持靜默。根據現有數字，在1998年，中國的國有部門佔國民生產總值（GNP）的37%，私有部門佔33%，集體部門（其中包括私有財產）佔其餘部份。在過去四年中，私有部門一直在增長。官方宣佈的失業率是3%，但是事實卻非如此；在這個國家的北部較大城市中，失業率是20到30%。政府正在從國有巨型工業聯合公司的軀體上“減肥”，為了能夠將最賺錢的部份私有化。

中國官僚層的政策方向是沒有疑問的。我們必須把這方向清楚地定性為已走得很遠的資本主義復辟，儘管這些假裝維護市場社會主義〔中共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譯者註〕的斯大林主義權貴人物使用著虛假的措辭。越南的過程也一樣。

我們承認，中國政權正在抵抗帝國主義的某些要求。它要從技術轉移上得到利益，控制它的幣制，維護關稅壁壘（這在目前不會維持很長，因為它已經加入世貿），只准許外國資本投資在像高科技、石油、核動力等等，不與現有中國工業競爭的項目。把這個抵抗解釋為來自“工人國家”或“非資本主義的邏輯”，就大錯特錯了。那是中國官僚層這樣的意志的表現：要依據它自己的利益來恢復資本主義，要準備它自己能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它要轉變它自己為新的資產階級，但是對只會對國外資本家有利的復辟不感興趣，因為那最後會威脅它的權力。

在俄國和中國的情況中，我們都可以說，它們是正在為實現復辟而努力的親資本主義政府。我們在它們的經濟規律中，或在它們的行政機構的行動中，根本看不到任何使這個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邏輯。還有，我們可以從中國這十年公開的資本主義復辟的例子中得出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教訓：當這個復辟由一個強大國家和集中化政權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階段去實施的時候，這種復辟要比當它通過新自由主義、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震盪治療”來實施的時候，有效力得多。

資本家們已經得出結論：投資在一黨專政的國家中，要比向俄國經濟的無底洞放債安全得多。

對中國正像對俄國一樣，我們必須停止說它是一個工人國家，甚至一個極之墮落或變態的工人國家，一個“非資本主義剝削的社會”，或者一個過渡社會。如果正在進行的是一個過渡，那末它便是朝向資本主義的過渡，而在這個過渡中，官僚層是如此地在帶頭，以致要將它們自己轉變為新資產階級。

除非我們認為，中國不能夠改變它的“國家性質”，只因為中國共產黨仍在執政。現在看起來，對許多同志而言，這正是問題所在之處。他們顯然難以想像，資本主義的復辟居然正由一個在中國（或越南）稱它自己為“共產主義”的政黨來進行，雖然對俄國的情況他們比較可以想得通，因為在那裏官僚層的不同派系已經分裂為不同政黨，而它們之中的最大政黨已經拋棄“共產主義”這個標籤。

最後，我們的運動必須調整它對前蘇維埃各國、東歐、中國和印度支那的反資本主義的團結工作。在未來的年月中，這些國家將會是重大階級鬥爭的場所。我們的重點應該是由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工會積極份子與新獨立工會的新興份子進行團結工作。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運動向我們提供一個機會，把最先進的活動份子，把在這些國家中、在被經驗的交換所豐富起來的國際活動中形成的各個團體、各個運動團結在一起。為了要把最先進份子、那些提出要創立新的、反資本主義政黨的問題的人們團結在一起為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而戰鬥，我們就需要清楚地得出這十年資本主義復辟的教訓。它不再單純地是實行政治革命的問題，而是實行社會的民主的革命，與具有許多不同面孔的全球化資本主義決裂的問題。

美國侵佔伊拉克惡化局勢

亞·托納特

美英兩國用上大規模的火力打垮了薩達姆的政權，並且全部佔領了伊拉克。在布殊、拉姆斯菲爾德和沃爾福威茨的心目中，這就象徵著一個強大的軍事勝利，並且為了新的美國世紀，為了整個美國霸權建立於全範圍統治的思想，下一步就要沿著這條道路，依著他們的統治計劃走去。

他們這麼快地在自己心目中把敘利亞當作第二個“流氓國家”，是因為很有可能獲得“政權更換”，這意圖曾經使貝理雅和英國新工黨尷尬。以持久戰爭的概念看，伊拉克的陷落遠遠沒有結束戰鬥，這是很清楚的。美國共和黨右派在把戰爭向前推進。

戰爭本身沒有完全依照計劃實現。頭幾天裏，美國軍隊感到驚奇的是，伊拉克軍隊沒有投降（而且政權沒有瓦解），而是在各處都遭到抵抗。結果，由於任意使用軍事力量，他們反而自食其果，把這個國家置於侵略者控制之下的任務，其結果必將更加困難。大多數伊拉克人正在保衛他們的國家，而不是政權。

在美國侵略中，大量伊拉克人被屠殺。士兵的數字還未清楚——雖然5000人的數字曾經有爭議，這個數字是被低估的。大規模利用空中力量，必定會產生好幾萬的戰爭傷亡。

侵略已經使伊拉克變成無政府狀態和混亂，並且把它帶到一個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邊緣。當醫院的基本設備被搶劫時，美英軍隊站在旁邊，把日內瓦公約規定的佔領軍隊的責任置於不理。不論對於前薩達姆政權，還是被美國強加給的政權，劫掠者似乎都不予支持。美國軍隊已清楚表明他們的優先工作了。他們保衛油田和保衛石油部門（唯一不被洗劫的一個部門）都優先於醫院或者電力和水的供應。

當侵略軍到達巴格達時，儘管有些人示威和歡呼，但很清楚的，整體的伊拉克人卻抵制這種佔領，並且對侵略者的敵意日益增長，這部份是因為混亂，部份則因為他們的國家被外國軍隊侵略。當薩達姆的塑像被推倒了，就會有一些示威運動是得到美國軍隊資助的，並且被媒體加以誇大。

現在，在巴格達，幾乎每天都有反對佔領的示威運動，在巴勒斯坦旅館外面舉行的，那裏有美國軍事司令部（在該國的其他地方也有司令部）。除去薩達姆是一回事，被美國佔領又完全是另一回事。部份人更向佔領軍不斷進行襲擊。

在北方莫蘇爾，我們已經第一次直接看見佔領軍在街上鎮壓抗議佔領的示威運動。至少有12名示威者被殺，60多人受傷。美國軍隊鎮壓示威運動，示威者反對當局替美國徵稅。

英美統治層說，這不是侵略，而是一個解放戰爭，與此同時，拒絕允許庫爾德人或者其他少數民族建立分立的國家。拉姆斯菲爾德已講出一個原則，要依附於建立起來的傀儡政權。

美國正著手以加納將軍出任殖民地的統治者。加納是一個親以色列的將軍，而且是武器製造公司的首腦，他上

台將不經過選舉和不對伊拉克人負責任。

五角大樓和國務院曾經為伊拉克的放逐者應委任為傀儡政府首腦而爭議過。競爭的領先者是被證明有詐騙罪行的阿默德·查勒比，一個銀行家，不住在伊拉克許多年了，他與中央情報局有密切聯繫，就把他作為他們的理想候選人。

計劃建立傀儡政權的第一次會議是在4月15日，於空軍基地舉行，出席的只有美國軍方。這個會議遭到什葉派穆斯林多數派的主要組織：伊拉克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的抵制。

在佔領者獲得極大進展之前，他們可能容易地失去控制。當會議正在進行時，什葉派的一個大型示威運動正在納西利亞進行，要求美國佬離開這個國家，在伊拉克成立一個伊斯蘭國。納西利亞的人民對委任查勒比作臨時政府首腦，都抱著壓倒性的敵意。由英軍控制的巴士拉和庫特，什葉派教徒也有騷動。

當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的時候，為了重建伊拉克，發生了提出承包合同的令人厭惡情景，給予美國公司優先權的名單，其中許多公司基本上是共和黨基金的捐助者。

接著是由布殊計劃作為戰後計劃部份的、充分吹噓的巴勒斯坦路線圖，通過這件強加給巴勒斯坦人的約束衣，改變美國在這個地區的政策。今天，已經加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戰爭唯一結果，是確定地更加加強沙龍地位，並增加巴勒斯坦人每天遭受傷亡的數字。

除了英美許多人現在支持侵略，而不管大量的人繼續反對和進行“停止戰爭”運動之外，世界上大多數人民仍然繼續反對戰爭和佔領伊拉克。

聯合國繼續作壁上觀，儘管貝理雅追隨布殊的努力，把他們捲入戰後的局勢。美國與歐洲聯盟的主要國家（特別是法、德）之間的分歧加劇。他們知道，在美國政策後面的思想，是直接針對它在歐洲的帝國主義對手。

我們被告知：戰爭之堅持要打，是因為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然而卻沒有一件殺傷力武器被發現，雖然佔領的美國人現在有了通道到伊拉克全國去，並且接近伊拉克人民。五角大樓的發言人繼續說，他們「一定」會找到某些東西。

與此同時，反戰運動必須建成為要結束佔領、並且為要伊拉克人民決定自己前途的運動。美英謊稱戰爭是謀求解放伊拉克人民，如果那是事實，有一個容易的答案——滾出去，留給伊拉克人民去決定他們自己的政府。

我們為伊拉克人民的自決權而鬥爭，並且要求自由選舉出一個不受任何外國（不論是英美聯合還是聯合國）干涉的立憲會議。

**帝國主義軍隊滾出海灣去！
結束伊拉克的佔領！
同伊拉克人民團結起來！**

楊萍譯自《國際觀點》03年5月號

小泉政權的“司法改革”將剝奪市民訴訟權利

趙京譯

五月三十日，由日本律師聯合會發起，有一千三百多名律師、公害訴訟原告、勞動訴訟原告、各市民團體人士，在日本國會和行政機構“司法制度改革推進本部”（本部長是小泉首相）舉行遊行，抗議小泉政權借“司法改革”之名導入“律師報酬由訴敗者負擔”的制度。日本律師聯合會的本林徹會長在集會上指出：這個制度的實質就是剝奪市民的訴訟權利。

按照現行的制度，律師的費用由原告或被告分別負擔。這種制度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市民們可以行使諸如要求撤回不當解雇訴訟，停止大氣污染或美軍基地噪聲訴訟、醫療、保險被害訴訟，追究行政過失訴訟，股東追究企業違法行為訴訟，消費者訴訟等權利，對於日本社會的公平起到積極的作用。當然，由於日本的政府支付的援助貧民

打官司的“法律扶助制度”從2000年剛開始實行，其補助金也少得可憐，普通的市民對於律師、法庭總是望而卻步。

但小泉政權的“司法改革”不但不改善扶助制度，反而推出此“律師報酬由訴敗者負擔”制度，從根本上剝奪了普通市民訴訟政府、大公司的權利。一個赤手空拳的市民怎麼可能挑戰擁有強大財源（稅金）、情報、知識、信息的政府部門或大公司並準備支付對方雇用的上億日元律師費用？怪不得由八百家大企業構成的“經營法友會”積極推動支持小泉政權的這項“改革”。這也暴露小泉政權“改革”的強化國家政權、企業管理的反人民本質。（I）

（譯自《橋樑》周刊2003年6月9日第1783號）

菲律賓左派的發展

彼亞特·羅徹特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東南亞的革命進程長期地受印尼和越南的發展所支配。可是，1965年血腥鎮壓印尼共產黨之後，和十年後越南抵抗的歷史性勝利（雖然是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所取得），這個革命進程持續不斷的鬥爭，在菲律賓被公認為最不屈不撓的。

從1975到1985這十年期間，菲律賓的革命運動是由菲律賓毛派共產黨所控制。1972年頒布的“戒嚴令”，結束了極左的菲律賓共產黨另一派（PKP）最初的有條件投降的多元思想（這派非共曾經親蘇）。就反斯大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派系來說（包括一個托洛茨基主義小組織，這個小組織已消失了），他們被證實沒有能力維持其活動。盡管遭受巨大損失，菲律賓共產黨（CCP）基本上是單獨地組織群眾抵抗馬科斯的獨裁統治，進行游擊鬥爭，它因此而取得了持久的領導權。當馬科斯獨裁政權在總統大選中崩潰的時候，在廣大的民主動員和軍事叛變結合在一起的壓力下，這個領導權在1985-1986年間分裂了。菲律賓共產黨（CCP）領導者無法相信，根據一個戰略綱要，這個政權會被推翻。這個戰略綱要的內容跟菲共內農村包圍城市的信條相距甚遠。在危機的時刻裏，一些有名人物和急進的少數派（包括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曾擴大他們的活動範圍。毛派菲共內部存在的分歧加劇，直到1992年的開除和分裂為止。這就使遠左派的多元思想重新抬頭。

由於世界局勢的變化，和毛主義運動的危機，使菲律賓戰土面對根深蒂固的問題。他們表示有必要吸收、融合其他國家的經驗，並且參加各種各樣的革命組織之間的對話。從菲共分化出來的各個組織，新近達成了一項共識。因此馬尼拉（菲律賓首都）的地區組織愈加親近澳大利亞社會民主黨。在群島南部的棉蘭老島中部的革命工人黨（RPM-M）與第四國際建立起聯系。

在第四國際和革命工人黨之間建立政治和組織的聯系

是一個時機。革命工人黨有著上千成員，卻未獲得合法承認，是由社會各方面人員融合而形成的組織，因而有能力在社會各個領域進行活動（如群眾動員、選舉活動和一些秘密行動）。當然這也是對第四國際的一次考驗：它必須成爲一個能融合不同傳統的組織，更能承受戰鬥的一代人的傳統。這輩代人在獨裁政權之下，在艱難的游擊鬥爭的架構中，在菲律賓得到了初步的經驗。因此革命工人黨明確表現它自己，就像菲律賓共產黨分裂出來的分子那樣，自稱爲馬克思列寧主義（ML）從而把自己和傳統的路線決裂（菲律賓共產黨認爲它自己具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然而，在歐洲“馬列”這兩個字頭曾被毛派所盜用。

此外，在全國規模上，建立一個新的革命黨的過程，還遠沒有結束。革命工人黨一直嘗試在該國中部和北部聯合源自菲律賓共產黨的其他組織。這個嘗試已告失敗，部份是因為複雜的政治形勢。南部存在著政府軍隊和穆斯林武裝之間潛在的戰爭狀態。武裝的組織在擴展（在他們當中，菲律賓共產黨有時還暗殺他們以前的同志）。自然，在這種情況中，那是很難和政府簽訂並非投降的和平協議的。統一的組織有一翼接受了這種協議，在棉蘭老島的革命工人黨就正確地加以拒絕了。聯合於是流產。在源自首都菲律賓共產黨分裂出來的武裝力量和特別親近澳大利亞社會民主黨之間，有一種聯合的新嘗試正在進行，棉蘭老島的同志也贊同地追隨著他們，但不希望太快地介入他們之中。這樣，即使第四國際在某一個國家同一個組織（像革命工人黨那樣）建立起密切的聯系，革命力量的重新組合問題，仍要存有巨大的長期的政治重組過程的內容。

（楊萍譯自《國際觀點》02年9月號）

拉美各國革命運動和左派的發展

厄·赫雷拉

阿根廷的革命運動缺乏領導力量，這是革命運動停滯不前的主要因素。各個不同的托洛茨基組織（MAS托派組織除外），正利用“革命危機”、人民鬥爭的不同場合、工人階級自主組織以及直接的人民民主，使他們自己參加到街區聚會中去，他們以此建立了自己的支部，吸收了新的戰士，但遺憾的是，沒有採取積極步驟，與薩摩拉陣線（自主解放運動）一道去實現反資本主義的左派團結綱領。儘管如此，上述的做法有利於各托派組織開展橫向活動，並進一步地向“傳統”左派的政治組織提出質疑。

在厄瓜多爾，由於帕查庫蒂克（多民族統一新國家黨）內部出現危機和分裂以及CONAIE運動內部存在著妥協傾向，革命左派未能在社會運動的起義高潮中充分發揮作用。

在哥倫比亞，社會政治陣線與軍國主義戰略保持距離，因而加強了社會民主運動。

在烏拉圭，廣泛陣線的向右擺動，使左翼思潮派（即以托派為主力的組織）處於孤立狀態，但儘管有此弱點和內部矛盾，左翼思潮派仍能從急進主義立場出發去反對改良主義。

建設這支領導力量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這不僅表現在同改良主義綱領和左翼社會民主以及社會自由主義傾向的戰略性爭論中，而且特別表現在發動群眾運動去同資產階級右派和帝國主義作鬥爭中。如果我們認為已有了新的人民總動員的興起以及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則我們還得承認相反的傾向，這就是民主命令主義，民主的後退傾向，局部的或大規模的鎮壓，左派的不穩性，人民的一民族主義統治，反革命的後果等等。

這支領導力量，不論在推動群眾性自主組織的發展，組織自衛鬥爭以及批判改良主義幻想（即不經過矛盾鬥爭和暴力也可以實現體制“改革”），都是最基本的力量。

我們贊同建設一個左派以及對抗運動的堅定核心。但這一堅定核心不可能在“小組織病態活動”的基礎上建設起來，同樣也不可能為了維護“我們第四國際的一致性”而取消了戰略思想和大膽創舉而建設起來的。第四國際各組織和戰士們，在面對這雙重任務時，必須在建設這支領導力量中充分發揮其作用。

一方面，為了有利於保持、加強左派以及人民力量的廣泛團結，托派組織和戰士們要參加重建左派陣營，包括勞工黨、廣泛陣線和社會政治陣線等。另一方面，各托派組織必須要看到左派陣營內部的危機和裂痕，要用他們自己的戰略綱領去對抗社會抵制運動和人民要求的過激主義。

儘管各左派組織的行動節奏和規模各不相同，但他們在行動中都懷有一個遠景的看法，這就是要重新組合革命左派，包括社會抵制運動內的急進主義。這樣一個政治上的重新組合的遠景，已在下列各托派組織的嶄新經驗中表現出來：例如烏拉圭的左翼思潮（CI），哥倫比亞的現代

社會主義黨、波多黎各的社會主義陣線以及巴拉圭的人民社會主義大聯合等等。

處在社會危機和階級鬥爭的局勢下，第四國際各種力量都有積極的作用。在多數情況下，他們促動並組織了日常的群眾性鬥爭。他們參與所有的動員工作，參與團結運動、網絡和論壇運動，這一切運動都體現出不同的抵抗經驗，反映出社會經驗和綱領制訂的空間，如同世界社會論壇的運作一樣；與此同時，他們也參與ATTAC運動，世界婦女進軍、反美國貿易自由區、取消外債運動、反哥倫比亞計劃，參加聖保羅論壇和工會活動等等（參見阿根廷、哥倫比亞、智利、巴拉圭、波多黎各、墨西哥、烏拉圭等國的左派及托派活動）。

所有上述經驗同樣豐富了第四國際本身在政治上和綱領上的積累能量，只要第四國際能夠確立一種互相交換意見以及內部交流的良好關係，只要第四國際能為了反思和行動而提出各種建議和共同任務，這一目標便會實現。

急進派和反帝力量重新組合的遠景，要求我們把積累起來的經驗，運用在革命的多元主義中，這便會超越我們自己（托派）的組織界線。

這樣的遠景只會出現在這樣一個時期裏，即政治和社會的矛盾加速了，危機加劇了，自我批判的革命思潮的再度調整加速了，這裏同樣包括來自各不同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潮在內。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我們有必要創造網絡組織和締結協議，以便使不同的經驗和政治戰略的選擇走向社會化，有必要公開我們的“要求和建議”，並拋棄那令人氣餒的“自我肯定”的小氣候作風。

不錯，要提出和實現我們（第四國際）的“任務”，還會碰到許多困難，第一，我們只能及時地並以系統方法來研究新問題，作出策略上的選擇，重新確定綱領和戰略性鬥爭；第二，目前的形勢對我們來說，除了巴西是個例外，我們在未來體制的“可見度”上還是很不充分的。

因此，第四國際各組織的建設是處在下列的形勢下：首先，仍然存在著緊張和破裂的局面；其次，富有經驗和連續性的戰士核心（指托派戰士）與來自其他傳統和鬥爭經驗的戰士們結合在一起；第三，我們還須與思想和行動敏捷、富有活力的年輕人結合起來。要處理好這種多樣性、差異性，會產生在政治選擇上的各種矛盾和混亂。但不管怎麼樣，我們第四國際力量，在本大陸各國中，會繼續大力地參加到反帝、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和鬥爭中去。

（註：厄內斯托·赫雷拉是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書記之一，是烏拉圭廣泛陣線中“左翼思潮派”的領袖，他現任左翼思潮派月刊編輯。）

（蕭明譯自《國際觀點》03年3月號）

處於革命邊緣的委內瑞拉

G·傅利

在委內瑞拉，狂妄的右派集團，包括大企業主和工會官僚，決定要推翻查韋斯的人民黨政權，已經激怒了廣大的窮苦人民和被壓迫群眾，委內瑞拉的革命運動有一觸即發之勢，這對於帝國主義和當地資產階級來說，其威脅性要遠遠超過查韋斯的改革運動。

1月3日，支持現政府與反對現政府的兩派群眾，在首都加拉加斯發生了衝突，這表明群眾的活動能力，已非前軍人官吏所能控制了。

墨西哥《國民日報》報道說：加拉加斯警察襲擊支持現政府的一派群眾，由查韋斯直接控制的國民衛隊向兩派群眾發動攻擊。支持一派群眾中有2人被加拉加斯警察在互鬥中擊斃。1月6日《紐約時報》報道說，武裝起來的查韋斯支持者同樣開槍射擊警察，傷2人。這樣，如果查韋斯政府沒有取得進展的話，一場潛在的革命必將爆發。

查韋斯總統有一次對原籍巴西的急進農民運動群眾發表演說時說過，“由左派集團發動的罷工，是注定要失敗的，因為人民群眾與我站在一起，同時也正因為這次罷工並非真正的罷工，而是由腐化的公司法人和工會官僚所煽動起來的變相政變”。

委內瑞拉的軍隊中也分成兩派，得到查韋斯同情的是下級軍官，他們由白人、黑人混合組成，而高級軍官則純係白人。當高級軍官伙同大老闆試圖推翻查韋斯政府時，下級軍官與廣大貧苦人民一起支持現政權。

委內瑞拉右派集團和帝國主義支持者，力圖阻止階級的兩極分化，但實際上兩極分化不但在委內瑞拉，而且在拉美各國也更加劇了，這就使階級衝突日益擴大和深化，而與利害有關的風險性也急劇地上升了。

委內瑞拉的衝突已成為拉美各國反對帝國主義進攻政策——在新自由主義名義下——的暴動起義第一線了。

巴西新當選總統盧拉是支援查韋斯的。盧拉迫使剛去職的總統卡多索，運送50萬噸石油到達委內瑞拉，以緩解因右派集團挑動罷工而形成的石油短缺。

盧拉的行為具有象徵意義，但激怒了委內瑞拉的右翼反對派，他們在巴西駐加拉加斯大使館門前，發動抗議示威。但這只能表明查韋斯在政治上的重大勝利。1月3日當查韋斯出席盧拉總統的就職典禮時，他乘此機會宣佈說，他有決心打敗右派的進攻。查韋斯把盧拉比作拉美獨立戰爭時的巴西英雄西蒙·玻利瓦爾（1783—1830）。

日前，查韋斯高興地說，政府力圖要控制局勢，因為這是一場挽救我們國家的戰鬥，是反對叛徒的愛國主義戰鬥，這些叛徒正用匕首從我們的背後刺過來。

帝國主義和親帝國主義份子的篡權陰謀是昭然若揭的。有兩個例子足以證明。第一，1973年時，帝國主

義份子動員右派集團推翻了智利的阿連德政府。第二便是針對查韋斯了。儘管查韋斯尚未準備徹底消除反革命運動的根子，但他最近幾個月來，抵制了他們，並且粉碎了四月間的軍事政變。

值得注意的是：委內瑞拉反革命運動的主要原動力就在於以石油為基礎的經濟。石油輸出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巨額的現款，這就為享有特權的中產階級提供了經濟基礎，但這個中產階級已發現受到窮苦大眾的包圍，這批窮苦大眾從沒有從石油礦源中獲得任何利益。查韋斯政權的抵抗力量就是從委內瑞拉人口的兩極化以及軍隊中的下級官兵中得到支持的。

美帝國主義作出種種努力，希圖掩蓋它對推翻查韋斯政府的支持，說甚麼它正在推動查韋斯與反對派之間協議解決問題。美國的石油公司否認它們阻止從委內瑞拉輸出石油，而委內瑞拉政府官員則指責它們阻止石油輸出是確有其事的。

然而，委內瑞拉右翼反對派的行為十分猖狂，他們甚至威脅著要在總統府內舉行群眾游行，佔領加拉加斯，最終要建立他們自己的政府來對抗合法選舉產生的政府。一句話，這就是右派所謂“革命”的綱領。

在這樣條件下，委內瑞拉國內衝突風險急遽增加，不論其後果如何，都會對整個拉丁美洲產生影響。查韋斯的失敗或投降，那必將給反帝起義帶來嚴峻的後果。

委內瑞拉的右派暴動，必將加劇了勞苦大眾的反抗，顯然，這是美國統治者所最關注的。同樣不假的是，美帝國主義者大多也無能控制住反動力量的強暴行為。

在這次國內衝突中湧現出來的最大問題，那就是群眾動員起來反對右翼集團進攻的規模及其深度，目前勞苦大眾正千方百計地自己組織起來，建立他們自己的卓有成效的領導集團。

查韋斯顯然不能解除右派的武裝。唯一可以擊敗右翼反對派的戰略，是使主要工業，特別是石油工業部門國有化，並使它們接受勞動人民的民主控制。這就需要深入動員和組織廣大群眾，包括武裝起來。

現在需要的是比查韋斯政府強有力的領導層，是種種完全不同形式的領導層，才能完成這一歷史任務。能夠滿足群眾這一要求的，便是建立一個革命政黨，這政黨的政綱是徹底重組社會和經濟，委內瑞拉廣大人民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革命政黨，等待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蕭明譯自《社會主義行動》03年4月號）

關於委內瑞拉的局勢

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

- 阻止右派、帝國主義的政變
- 決不陷進OAS〔美洲國家組織〕及〔其秘書長〕加維利亞所設的陷阱
- 積極地與委內瑞拉的工人、人民的鬥爭團結一致

1. 與「總罷工」一起開始的、因現在正被作為「最後戰鬥的行動」而加深的這個右派攻勢，是反革命戰略的一部份，這個戰略的目的，是要推翻查韋斯的合法、民主的政府，和擊碎工人們、學生們和人民大眾的自我組織、自衛的進程。

由於對政治和社會的積極份子的不斷謀殺和各法西斯團體的挑釁，以及由於PDVSA〔國家石油公司〕的黑手黨和CTV〔與傳統執政黨同盟的工會聯合〕的腐敗領導在〔2001年〕12月初所發起的對石油生產的怠工，右派的這個攻勢的升級已經具有犯罪性質了。

資產階級破壞穩定的活動，在傳播媒介特別是電視的支持下，旨在進行政治操縱，製造恐懼、經濟混亂和軍隊內部的分裂，因為一直到現在，軍隊是支持查韋斯政府的。

2. 那個正在準備對伊拉克進行新的大屠殺的同一布殊政府，也在這個反革命的升級中，扮演一個決定性的角色。它不但公開地在政治和財政上支持參加政變的人們，而且通過OAS這個奴隸般的工具——與該地區大多數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政府、歐洲聯盟及卡特基金會等機構共謀——推動一個「外交干涉」，其目的就是要終結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的民主政府。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理查·布歇的幾次聲明都清楚地說出：「我們已經著重OAS秘書長加維利亞的任務的重要性，因此，雙方應該與他合作來解決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在以帝國主義利益為重的語言中，「合作」只能被瞭解為脅迫委內瑞拉政府接受「民主對話」為它的政治投降的先驅。

加維利亞這一前哥倫比亞總統、反叛亂運動的推行者、準軍事團體的提倡者，應對有系統地在他的國家違反人權的事實負責，他的「任務」必須徹底加以譴責。

OAS試圖走上帝國主義者——大企業無法在2002年4月11日〔的失敗政變中〕實現的「民主憲章」的道

路，因此正如左派和玻利瓦爾各人民團體所證實的，與右翼政變參與者和大企業是無法進行「對話」的。

3. 一場決定性的戰鬥正在委內瑞拉展開。玻利瓦爾人民已經超越了查韋斯政府的局限和躊躇，走上街頭，加深與資產階級破裂的過程，而且採取各種阻礙政變活動的措施。現在不但這個國家的民主的命運，而且整個區域與帝國主義的力量關係，都處於危急關頭。

由於盧拉在巴西、古鐵雷茲在厄瓜多爾的選舉勝利，由於「阿根廷起義」〔指阿根廷人民在2001年12月19、20兩日連續快速地趕走四位總統的起義〕之作為人民反叛過程的延長，由於反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抵抗運動的成長，以及由於整個拉丁美洲人民拒絕哥倫比亞計劃及美洲自由貿易區域的再殖民主義的方案，美國正在試圖建立一道牆，來「防禦」吹遍了整個拉丁大陸的變化之風。

推翻查韋斯政府和擊碎正在發展中的人民、工人們的激進運動，正在變成華盛頓的反革命戰略中的優先考慮事項。查韋斯政府的繼續生存——以及已發展的階級鬥爭的動力——對五角大樓〔指美國國防部〕及國務院而言，不符合哥倫比亞計劃和美洲自由貿易區域所意含的區域性控制。

在這同時，政變及帝國主義利益在委內瑞拉的勝利，更會減少像盧拉和古鐵雷茲的政府那樣的、政治、經濟的機動空間，更會增加對哥倫比亞武裝叛軍的不利條件，而且更會加強對古巴的封鎖。

4. 就是由於這個情勢，支持委內瑞拉人民群眾鬥爭的國際團結運動，必須是廣大、活躍和富於戰鬥性的。委內瑞拉的工人、學生、有階級意識的工會和人民團體、玻利瓦爾的左派圈子和左派政黨的鬥爭，就是拉丁美洲人民反對統治階級精英份子、反對新自由主義、反對國際貨幣基金會、反對世界銀行、反對美洲發展銀行和反對債務的鬥爭。它是一個爭取主權、爭取人民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的民主鬥爭。第四國際的各種力量是這個鬥爭的一部份。在各種不同的國家中促進公眾的團結、示威、游行和發表政治宣言等活動！無條件地參加、支持由各民主、反帝和革命的團體和黨派所組織的行動和抗議運動！

2003年1月4日發佈

〔兆立譯自《國際觀點》2003年2月號〕

烏拉圭的當前局勢

——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切後果和出路都已經敞開了

左翼思潮派

對抗陣營

〔新自由主義的崩潰和政府合法性的喪失，恰好與工人鬥爭以及左翼思潮派學生鬥爭的發展壯大相會合。在這種局面下，2002年9月14-15日，烏拉圭的“左翼思潮”派（以下簡稱CI）舉行了第三次代表大會。CI擁有350名積極份子，800個會員，團聚了來源不同的左翼急進戰士，其中包括托茨基主義者、民族解放運動（以下簡稱MLN）和獨立人士。CI是烏拉圭廣泛陣線（以下簡稱FA）的一個組成部份。FA是在軍事獨裁統治下建立起來的左翼聯合陣線的常設機構，其內部社會黨人是起著支配作用的。去年5月，FA領導機關進行選舉時，CI（左翼思潮派）在總數20萬票中，獲得6千張選票，CI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文件（113票贊同，28票反對，11票棄權），文件內容摘譯如下：〕

腐朽的舊經濟模式帶來了全社會的經濟災難：失業、貧窮、基本人權和工人福利受到剝奪，以及民主權利的倒退等等。與此同時，群眾的憤怒和抗拒，表達了鬥爭的意志，和對野蠻資本主義的反抗。有組織的或自發的集體行動——暴動、抗拒服從——正在不斷地削弱全社會的一致性。危機加深，忍飢挨餓群眾的起義，成為最強大的力量，推動FA（烏拉圭廣泛陣線）去發揮其震驚全社會的作用。

所有上述這些帶有爆炸性因素的會合，會使當今聯合政府的可信度失去，並削弱其在社會上和競選中的基地。這就說明了，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切後果和出路已經敞開了。我們時代的標誌是政治的不穩和階級鬥爭的日益高漲，誰也不可能先驗地排除任何後果，而人民的抵制將會起到主要作用。

用來加強新自由主義進程的三大重要因素：高效性、穩定性和合法性已經幻滅了，繼之而來的便是政府危機、資產階級各政黨以及後獨裁制政治統治體制的危機，聯合政府加深了依賴性，決策權交給了美國政府及其國際附屬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和國際發展銀行等等。科洛拉多黨和民族黨已經簽了新的殖民條約，這就完全屈服於帝國主義的新殖民化的政策。

統治者文化經不起考驗

FA（廣泛陣線）曾作出努力，要避免混亂局面，但混亂仍然到來，並且還會繼續存在。這種混亂局面完全暴露出FA內多數派領導戰略的弱點，這是很清楚的。FA多數派領導的戰略包括有“民主統治”，“成為有建設性的在野黨”，“社會協調”，“對原有體制的忠誠”，“適應大選時間表”等等，但這“統治者文化”是經不起考驗的。FA內的少數派領導，即左翼思潮派已提出了不同建議，他們要求親資本主義的、愚蠢腐化的政府下台，要求國家走另一條綱領性道路，要求巴特爾總統和國際貨幣基金會退出政府，立即舉行大選。他們的建議是要求達到、直接民主、急進民主，同一切主張階級調和的重建民族政府的創議完全割斷聯繫。

最近幾個月來，由於危機加深，“人民的戰鬥”場面擴大了。所有這些抗議、組織起來的對抗運動，都表示反對資產階級所提出的理論神話，說甚麼“烏拉圭是個例外”，“我們需要社會和平”等等。由此看來，統治者還沒有時間和空間來恢復基本的社會權利，除非出現奇跡。工人階級，包括工資勞動者、失業工人、社會市民，是這次示威抗議的主角，對抗陣營十分龐大，成份複雜，變化多。對於社會集團和左派戰士的干與來說，決沒有顯示出各享特權的特點。自主組織的傾向加強了。這種大規模的集體行動的鬥爭，就是對社會——經濟改革和新自由主義的反改革作出的回應。對抗陣營並沒有把自己限制在已經組織起來的工會主義的框框裏。也沒有限制在急進的、劃分成地區的反對派框框裏，群眾鬥爭以及為求生存的个人和集體戰略的文化表現都已發生變化了。

現在提出的階級同一性，實際是濫用了或混同了市民社會這個範疇，所謂市民—工人，市民—企業家，這裏把富人和貧民說成是市民鄰居。確切地說來，否認或拒絕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的。階級矛盾存在於剝削制度內部，而且這種矛盾因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市場民主化”而日益加大加深。

反資本主義左派

左翼思潮派（CI）需要加強其政治特性，加強組織和作用，這是與社會—經濟危機加深，人民反抗速度加快相一致的。CI第三次代表大會沒有忽視以下的巨大挑戰，第一個挑戰是：把主張階級鬥爭的左派，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組織起來，使他們能提出全部迫切的建議——民主化和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以此來確保不會因清算計劃、失業、貧窮和飢餓，而使人民運動、工人運動遭致失敗。其綱領應同基本的社會需要相協調，能制止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征用”進程。第二個挑戰是：要把革命的社會主義左派所積累起來的政治經驗和戰鬥經驗明確起來。急進陣營中的橫向組織是很廣泛的，誰也不能說左翼思潮派（CI）是烏拉圭的唯一急進左派。今天，這種橫向組織比10年前意義重大得多了；在各種社會運動中，都會出現大量積極份子，不論是民族解放運動（MLN）或共產黨或三、二六運動（卡斯特羅份子）或人民勝利黨（PVP）甚至社會黨內都可以找得到這種積極份子。

各橫向組織的存在，不是主觀主義的產物，而是客觀條件所形成的。因此，如果沒有一項政策把左派中的左派也團結起來，那只能起到救世主和教條主義的作用。FA（廣泛陣線）的多數派領導就有這樣的傾向，反對這種傾向的一個左派便建議走另一條道路，要求結構性改革，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改革，建議把每日的反新自由主義鬥爭同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鬥爭聯繫起來，這個左派反駁了“人道化資本主義”、“全球化不可避免論”，揭開了“窮人反窮人戰爭”的這一論點的虛偽性，最後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體制的綱領，儘管這個綱領現在還不是急於提到議事日程上。

（蕭明節譯自《國際觀點》03年1月號）

厄瓜多爾軍人統治與階級鬥爭

社會民主思潮派

〔下面這篇聲明，是由社會主義民主思潮派（第四國際厄瓜多爾支部）發出的。聲明內容共18點，現擇其較重要的幾點節譯出來——譯者註。〕

厄瓜多爾國軍前上校古鐵雷茲，在2002年1月24日的競選中獲勝，當選為總統。

1．古鐵雷茲作為總統候選人，曾得到三個政黨的支持，即他自己的黨——1月21日愛國主義黨，多民族統一新國家黨帕查庫蒂克運動以及人民民主運動。

2．競選中投古鐵雷茲票的這種政治和社會支持，具有明顯的階級性——他的選票來自廣大的勞動界，即來自工人、農民、印第安人、零售小商人、退伍軍人、手工藝者、教師、大中學校學生、雇員以及城鄉小業主。

3．在選舉中形成的聯合陣線，從政治和社會角度來看是分散的，缺乏革命的人民領導，及有單一的政治領導機構，也不是在各土著民族或工人的掌握下，而是在軍人首腦的領導下，軍人首腦宣布說，他的理念就是通過軍事培訓，因此這種政制只是在人民民主民族主義的傳統限度內。

5．競選綱領中固然能體現出反對腐敗銀行體制，反對不講誠信企業、質疑腐朽的政黨，但並未觸及到自由貿易區和外債等主要問題。

7．這次民主選舉必將繼續推動民主鬥爭。

8．投票選舉古鐵雷茲，同時也體現出人民及土著領導層對政權的看法，他們不追隨不受限制的軍人統治，而希望在轉折關頭時看到“古鐵雷茲政權的前進希望”。因此在最近十多年來已經成熟了的參選者和他們的思想情操也都被吸引到這次選舉鬥爭中來。

9．尚未得到滿足的要求以及如何解決因美元化政策而加深了的經濟危機，是支持古鐵雷茲競選的重要組成部份。現在一系列急待解決的問題都提出來了，包括住房、物價、信用、就業、土著運動的基本必需品以及農民提出的保護高原、水資源和土地。

11．這次選舉反映出人民的憤怒，也是反對過去生

活方式，反對政治體制的選舉。城鄉青年中具有激進思想的那部份人，第一次參加到國家政治生活中來。

12．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選舉中的古鐵雷茲，不但得到最重要城市的支持，而且也得到周邊地區，特別是山區的中心省份以及亞馬遜河流域的支持，山區省份主要是得到強有力的土著農民的支持。

13．在廣大人民的自發意識與有組織部門之間，我們看到了這兩種勢力的滙合，現在就要設法加深發展這種滙合，並在目前危機形勢下使其具有連續性，去反擊因美元化而帶來的經濟政策，左斯塔沃·諾博政府便是推行這種政策的，結果是進口多出口少，缺乏國內外生產投資、通貨膨脹以及財政困難。

14．在第一輪選舉中，已經暴露出政治矛盾，在第二輪選舉中，這種特點更加明顯。

15．大多數傳統的政治勢力宣佈說，他們是獨立於兩位總統候選人之外，並且斷言未來的政府，其壽命都不會超過幾個月，因為沿海城市與山區之間的區域矛盾正在加強。古鐵雷茲並沒有意識到，財政資本獨裁制及力圖推行新自由企業綱領的進口商，與厄瓜多爾社會的其他部門之間，正存在著衝突。更尖銳的階級衝突正在展開，但人民運動不論在基層或在上層領導，都沒有為此衝突作好適當的準備工作。

17．我們的任務（即第四國際厄瓜多爾支部），必須要聯系現有的人民認識水平，並大力將其推向前進，並把當前的迫切要求與反對剝削、壓迫和統治的要求聯繫起來。

18．最先進的組織必須投身到鬥爭中去爭取選舉勝利，但不可放棄自己獨立性而要為自身綱領作出貢獻。綱領的中心原則是擴大人民民主，反對自由貿易區、哥倫比亞規劃、財政資本獨裁制和新自由化政策，要把下列要求放到中心地位上，這就是結束結構調整，關閉美國在曼塔（manta）軍事基地，廢除外債，為保護水、土地和所有自然資源作鬥爭。

——社會主義民主思潮派（第四國際厄瓜多爾支部）
全國領導中心·2002年10月22日

（蕭明譯自《國際觀點》03年1月號）

巴西工人黨左翼的進展

J. 博格斯

在巴西各州選舉中工人黨取得的成就，已相當地改變了巴西聯邦政府的局面。令人感到特別驚異的是聖·保羅州的選舉，因為該州州長候選人喬斯·吉諾姆，是工人黨左翼人士，他贏得 32% 有效選票，這是工人黨在州選舉中從未有過的最佳記錄，他將首次參加第二輪選舉競賽，他已擊敗了右翼候選人馬勒夫，馬勒夫僅贏得 21.8% 有效選票。在某幾個州裡，工人黨候選人的得票率也比預期的更好。但也有值得擔憂的情況出現。譬如在南里奧格蘭德州，該州政府本是工人黨顯示實力的主要陣地，但在這次選舉中，工人黨候選人塔索傑羅在第二輪競選中僅贏得 37% 有效選票，而右翼候選人里戈托（Rigotto）卻贏得 41%。

在巴西西北部，靠近祕魯邊界的阿里州，工人黨取得了勝利，喬治·雅安納重新當選為候選人，而在安奧伊州，工人黨候選人在第一輪選舉中取勝。

談到國會參眾兩院議員的選舉，儘管成績不很突出，但工人黨的議員席次增多了，成績不突出的主要原因是把一些席位讓給了盟友——自由黨人。

最後，應當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工人黨左翼在選舉中的進展，如果我們再把左翼不得不遵守它所反對的全國政治方針考慮進去，則左翼的進展是更加可觀了。

據約略估計，在工人黨當選為聯邦眾議員的 70-80 人中，有 10 人加入了得到社會主義民主傾向支持的名單中，即增加了 15%。社會主義民主傾向的支持者當中，還包括南里奧格蘭德州副州長來古埃爾·洛塞托，阿雷格里港前市長現任州的眾議員勞爾爾特，以及阿拉戈斯州參議員 H·海倫娜。

當選為參議員的亞娜·朱麗婭，來自帕拉州，也是工人黨的左翼分子，合計起來，工人黨左翼約佔聯邦眾議員的 30%，這個百分比，遠遠地超過以前的數字了。

2002 年 7 月 21 日

（蕭明譯自《國際觀點》02 年 11 月號）

巴西有可能 實現另一種經濟模式

社會主義民主派

〔巴西工人黨總統候選人盧拉，在 2002 年 11 月總統大選中獲勝，當選為巴西現任總統，這是一次富有政治歷史意義的大事。現在擺在盧拉政府面前的一個重大任務是：繼續推行過去歷屆資產階級政府所推行的舊經濟模式，即資本主義模式呢？抑或是創造、推行另一種新經濟模式，即社會主義模式呢？〕



巴西工人黨是由以盧拉為代表的工會急進派為多數派，以及由社會主義民主派（它認同第四國際）為少數派組成。現今，多數派擬繼續推行前卡多索政府所推行的經濟政策，即資本主義經濟政策，而少數派則力爭要推行新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因此，在工人黨內，以及工人黨與黨外的社會派別如社會黨、勞動自由化派等展開了激烈爭論。

這裏介紹的是工人黨少數派——社會主義民主派於 2003 年 3 月 15—16 日全國大會上所通過的有關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提案文本。〕

社會主義民主派認為，盧拉政府在創造推行新經濟模式時，應先有一個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不可太短促，必須有一個小心謹慎的準備階段，以便與過去卡多索政府的舊模式徹底決裂。

卡多索政府為了爭取巴西人民的信賴，曾推行過新自由化政策，這是在擊敗了民主與人民勢力之後才得以推行一段時期，現在社會主義民主派為了擊退新自由化勢力，為創造變革的條件，特提出以下四點具

更正

本刊上期（總第 212 期）有錯處需更正：

頁數	欄	行數	原有	應更正
5	右	20	醫療費，傭	醫療費，僱
35	左	14	a thousand	five hundred

1．重新取得經濟政策決定權的國家主權

十多年來因開放和解除控制所形成的後果，特別是1998年以來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簽訂了協議，而更加惡化了，這就是真正地把決定權讓給了國外勢力。正因此，就必須重新取得決策權的國家自主權。為達此目的，就必須控制財政資本。

要重新取得國家自主權，不受國外勢力控制，我們有多種不同程度的方法。首先推行最低的在巴西的居住期（例如最少為一年）。其次用稅收來約束外國人短期逗留。除了國家儲備金極端貧乏情況之外，我們有必要把所有外匯營作集中起來，建立完全控制機制。

不論採取那種方法，外匯控制並不意味著同國際財政界的破裂。

此外，必須創造條件終止與國際貨幣基金會所簽訂的協議，因為這個協議要使我國經濟政策完全屈服於外國勢力。所有這些動議，都必須與改變國際力量相互關係的鬥爭結合起來，並加強負債國的運動，重新開啓外債的談判等等，在這方面，巴西要同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結成聯盟，這些國家的貧窮人口佔了有關國家的絕大多數。

美國提出的自由貿易區（FTAA）實質上要把拉丁美洲國家附屬於美帝國主義，我們必須堅決地予以抵制。

2．恢復政府對經濟政策決策中心的協調能力，在面對市場和從屬於過渡時期綱領時，保存決策的自主性

除了把經濟政策決策中心收歸國有化之外，並須在政府協調下把上述各項措施結合起來成為一體化，這是過渡時期綱領的邏輯威力，而不是為市場利益服務。

更主要的一點是中央銀行。自從把更大自主權讓給了中央銀行之後，這就無異於把更大合法權給了市場，並正式放棄了對經濟政策主要方面的控制權，這不僅給過渡時期經濟綱領帶來障礙，而且也給政府的一切機遇帶來了破壞性影響。

考慮到經濟政策特別是中央銀行的管理工作，要從屬於過渡綱領和政府，這就值得提出有關財政體制民主調節的一般性問題。中央銀行現有的利率方面任務，必須加以改變，並要建立各種辦法使其更透明，

更少受財政市場壓力的影響。

另一方面，必須減少財政資本對經濟的影響力。這是一個很大問題，因為它具有對銀行稅收政策，對公眾銀行重新國有化（而非私有化）以及加強和指導公眾銀行與政府綱領簽訂協議等等都有反擊能力。

顯而易見，所有這些措施，會同資本市場的投機利益發生衝突。但人們可以期望，從商業界中產階級、貿易主、農民，工會運動到更大量人民群眾角度來看，採取這些措施是具有大量合法性的，因為這可減少投機者利潤，用以保衛經濟發展、增加財富和巴西就業機會。不僅通貨膨脹會消耗掉財富，而且龐大利潤也會動搖家庭預算，特別是那些處於貧困線上的家庭。

3．重視新發展模式的民主軸心

新發展模式民主軸心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人民的參與管理，這是有決定性的，包括擴大民主，保護人權，建設參與管理機制，保護巴西的民主革命，與傳統的對外國勢力依賴性、社會排斥、專制獨裁、公用事業私有化等等徹底決裂。

國家的作用要重新予以定義，國家除了制定戰略性規劃之外，還要開展共同參與管理運動，這是必要的條件。

4．恢復必要條件，容許國家企業發揮戰略性作用

新的發展模式，要排除一切對國家企業的阻力，使其發揮戰略性作用。在卡多索政府時期，國營部門企業遭到私有化的摧殘，但仍然有大量國營企業保存下來，主要是在基礎設施方面，特別是能源工業。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恢復國營企業的投資能力。但過去，受國際貨幣基金會所強加的荒唐的技術標準的傷害，這不僅單純是技術問題，而且是以國家債務為代價的，這樣就減少了總的預算盈餘。最近為了要提高盈餘份額，使得國家投資成為不可能。

處理投資標準，作為國家債務的一部份，這純然是空論，是採用新自由化的概念，這與技術問題絲毫不相關，其目的在於使公用事業不可能發揮作用，必須予以堅決反對。

我們早已指出：實現新發展經濟模式是有可能的，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基本問題需要解決。現任盧拉政府已經引起注意了。我們這裏提議的四項基本措施，就是使新經濟模式得以推行的基本條件。

（蕭明節譯自《國際觀點》03年5月號）

從歷史看阿根廷

蔚然輯譯



2001年12月間，阿根廷發生了席捲全國的大規模群眾抗議示威運動，要求解決國家面臨的困難問題：沉重的債務負擔，嚴重的經濟衰退，貨幣貶值，物價高漲，生活水平下降，失業和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等等。真的，阿根廷的工人階級和廣大貧苦群眾有許多賬要同政治家和投機商清算。在嚴重失控的社會動亂中，總統換了一個又一個，仍不能使憤怒的廣大群眾和工人階級平靜下來。因為那些貪官和投機商在過去的年月裡盜竊了大量的人民和國家財富。

在過去的三年裡，阿根廷即已陷入經濟衰退之中。今日的困境是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這個國家在歷史上有過許多艱辛的歷程。

半個世紀之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可比得上西歐國家。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它目前的狀況正好是一個例子，說明資本主義制度沒有能力保證經濟的平衡發展。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鼓吹者斷言：允許資產階級賺更多的錢，不要限制，能夠保證經濟的發展，使每個人都有工做，並提高生活水平。但事實正好與這種說教相反。阿根廷的歷史就是明證。

依附帝國主義的經濟

從1816年起，阿根廷擺脫了西班牙的殖民統治而成爲獨立的民族國家。在最初的五十年間，它同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一樣，具有開拓的精神。但，與這三個國家不同，阿根廷從過去殖民時代繼承下來的依賴性和落後性，卻不能使它成爲富裕的國家。

正如80多年前列寧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指出的，帝國主義時期不僅有帝國主義強國和殖民地國家，而且「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財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屬關係的羅網包圍著。」列寧這一論點，就是以阿根廷爲例

子來說明的。

隨著獨立而來的全面自由貿易，使國家的商業和金融業開始得到發展，而在19世紀中葉阿根廷開始進入世界市場時，發展更爲迅速。歐洲的工業國家可以從擁有大量土地的阿根廷進口糧食了。而這個國家卻缺少勞動力——特別缺少現代技術的大規模運輸和糧食儲藏設備。阿根廷有1200萬英畝的肥沃土地，可以供應小麥、亞麻、牛和羊毛給全世界。

阿根廷對來自歐洲工業產品開放市場。它要求外國資本發展它所需要的基礎建設作爲回報。1913年，外國在阿根廷投資的總數的一半，其中三分之一用於鐵路，三分之一用於國家債券，其餘用於公共服務、貿易和財政金融。1914年，在平帕（Pampa）草原中央區的肥沃土地上，修起34,000公里密如蛛網的鐵路，可與美國相比。但，這些鐵路網是把布宜諾斯艾利斯港口同其他國家聯結起來設計的，而不是同本國其他城市聯結起來。在1870-1934年間，有400萬移民進入阿根廷，其中70%來自西班牙和意大利。

在1910-1920年，阿根廷的出口情況如下：小麥和油籽45%，肉類24%，羊毛13%，皮革6%。這個數字大約保持了60年之久。阿根廷的主要顧客是法蘭西人，比利時人，英國人。他們控制阿根廷進口的35%。

帝國主義列強並不想讓阿根廷從他們的技術中獲得利益。阿根廷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是從殖民時代繼承下來的土地制度。儘管掠奪（或屠殺）原住民印第安民族一直延續到1880年，土地一直是在少數大土地所有者的掌握之中。他們擁有25萬英畝以上的地產用於放牧，而傳統農業祇佔很少一部份。在1914年，從事農業的人口祇佔總人口的24%。由於國家有限的工業，使外國移民得以迫使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小手工業陷於絕境。

1929年的大蕭條使情況有所改變。它導致國家出口減縮，進口貿易減少了一半。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本國工業的發展。但在1930年至1950年間建立起來的工業，都是生產供少數特權階級消費的產品。這些產品原先是由外國進口供給的。而其他方面的工業如紡織、食品、煙葉、皮革、轉型機械和原油的投資則受到了限制。

二戰後，歐洲的困難經濟狀況引起世界物價飛漲。這使得1945年以後的貝隆政權得以籌劃大幅度增加貧苦階層的消費來換取社會的和平。從1946年至1949年，在國家收益中，工資所佔比例由37%增加到47%。

貝隆主義的「勞工聯合會」（CGT）

在1945-1955年間，貝隆當政。在此期間，阿根廷勞工聯合會（簡稱CGT）是貝隆主義黨的主要支柱。貝隆政權是一個邦拿巴主義政權。它的基礎建立在軍人、大公司、

老闆、工會的聯合力量之上。貝隆本人就是一個高級軍官。這個政權強而有力。它決心直接干預經濟，並擺脫英國的控制。它推行一項旨在使工會併入國家機構，把階級合作政策制度化，以保持社會的穩定。這個政權的特點：一方面借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聯合政府形式，另一方面也具有30年代墨西哥總統卡登納斯激進民族主義政策的色彩。這種國家的真正面貌可以從墨西哥革命所採取的把工會併入國家機構，使軍隊和工人階級支持為資產階級謀取利益的政策中顯現出來。托洛茨基對這種邦拿巴政權的性質作了如下的評說：

「在工業落後的國家裡，外國資本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因為本國的資產階級比無產階級相對來說較為軟弱，這造成了一種特殊狀態，政府必須在外國資本和民族資本之間；在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相對強有力的無產階級之間架設溝通橋樑。這樣，政府便具有一種特殊的內在的邦拿巴主義的性質。可以這樣說，這個政府是高踞於階級之上。它可以作為外國資本的工具，把無產階級置於軍事獨裁的鎮壓之下；也可以為無產階級的利益爭取更多的讓步，從而使自己對外國資本取得一定的自由來進行統治。」

在阿根廷，貝隆得到無產階級的支持，也得到資產階級的支持。兩者都樂意擺脫英國的控制。貝隆以煽動性的語言對無產階級講到關於社會革命的話：「我打算改善生活水平，保護全體工人甚至最貧困的人免遭資本的剝削。」這些花言巧語伴有民族語言的特色。他說：「我們播下種子，必定會綻開自由祖國之花。祖國的主權絕不出賣。」而當他對老闆們講話的時候，他把自己的意圖講得很明白，他說：「相信工人的工聯主義對僱主是有害的，這是極嚴重的錯誤。相反，它是幫助僱主避免同工人鬥爭的最好組織。」他強調說：「人們都說我是資本主義的敵人。但你們永遠找不到一位比我更有決心去捍衛資本主義的人了。因為我知道捍衛經理們、工業家們和商人的利益，就是捍衛國家的最高利益。」

阿根廷在二戰後出現的特別令人稱道的局面是由於推行了保證較高水平的工資政策，使得貝隆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這個政策的標誌就是一年有十三個月的工資。對此，直到今天，工人階級還念念不忘。貝隆主義的勞工聯合會（CGT）成了國家機構。直到1947年，外幣盈餘使政府能夠保證工人的生活水平，並為培養羽毛豐滿的工會官僚提供資金。那些反對新政權的，支持共產黨的工人被排除在勞工聯合會年會和各分會的會議之外。在1946-49年間，有幾百起工人糾紛被宣告為非法遭到鎮壓。《戰士》報分社遭到解散。勞聯會招募暴徒去襲擊罷工工人竟然毫無愧色。那些拒絕參加勞聯會的工人運動積極份子受到拷打折磨，甚至被殺害。

勞聯會官僚與貝隆

1955年，隆納迪將軍發動一次軍事政變，推翻了貝隆政權，貝隆逃亡到西班牙。隆納迪得到美帝的支持。美帝不欣賞貝隆的獨立政策。由此勞聯會變成了一個更加龐大

和鬆散的組織，它把各種不同傾向都結合在一起。其中貝隆主義者仍然佔著主要的地位，有62個組織。共產黨有10個組織。隨著貝隆的倒台，他的政黨（正義黨）被取締。在後來的20年間，貝隆主義者作為反對派，一直用勞聯會作為自己主要的喉舌。

勞聯會的領袖們在貝隆流亡期間，為了爭取貝隆的支持而彼此進行鬥爭。因為貝隆在阿根廷工人階級的心目中是一個活生生的神話式的人物，誰得到他的支持，誰就能保有權力。

貝隆主義運動作為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在1955-73年間，輪番登上權力寶座的所有軍事獨裁者和選舉產生的總統都不能不考慮到它。

60年代後的經濟狀況

在60年代以後，阿根廷的工業化擴展到新的領域：化工、重型機械和鋼鐵及汽車製造業，每年以8.6%的速度發展。但大部份投資都來自外國：汽車製造佔97%，電子工業佔70%。而一直是國家收益最大的唯一源泉的農業，卻保持著古老的生產方法。1960年每畝土地使用的化肥僅是美國的1%！而農村人口卻從1949年佔總數的29%下降到1970年的20%。在隨後的20年間，農業生產恢復到先前的水平，但卻付出了開墾荒地的巨大代價。1928年，阿根廷農產品出口佔全世界出口農產品的3%，而1980年下降到0.4%。

在1959-1969年的十年當中，阿根廷的許多公司都同外國的跨國公司緊密聯結一起了。在1969年，這些公司佔有全部工業資本的80%。在1955年至1976年間，歷屆政府都呼籲保衛國家經濟利益。但它們不敢得罪本國的資本家，更不敢同外國大公司對抗。

經濟崩潰

1969年工人階級在科多帕的起義標誌著一個群眾性激進化時期的開始。這使阿根廷的資產階級讓貝隆再次回到權力寶座上來（貝隆在1973年6月回國，同年9月再次當選為總統）。但貝隆這一次祈望用幾片餅乾來換取工人階級的支持是失靈了。他祈望減少工人對勞聯會的懷疑。但在1973年至1976年間，工人階級的戰鬥精神一直在保持高漲的時候，勞聯會官僚的政策同貝隆主義的右派和極右派的政策卻是一模一樣的。在1976-1983年間，曾有過兩次軍事政變，先是維地拉將軍的軍事獨裁，後又有更壞的加爾梯利將軍的政變。軍事獨裁給國家造成巨大的創傷，付出的生命代價，據統計就有三萬人「失蹤」。「失蹤」者的母親們直到今天還堅持提出公開的抗議，要求知道她們失去了的兒女命運的真相。而政治家們，包括激進主義者和貝隆主義者，卻要保護那些造成生命損失的責任人，即軍事政變時期擔任領導的許多軍方幹部，免於被控犯罪而受到刑事懲罰。至於軍事獨裁造成的經濟損失，也是非常沉重的。

1976年維地拉軍事政變集團要建立「自由市場」，撤銷了國家經濟機構，取消肉類和小麥的專賣，把大部份的出口讓給了私商，增加農業（大土地所有者）的補助金。

免除進口關稅使本國工業處境困難。由於實際工資的降低，製造工業產品的消費下降了。如汽車銷售下降1/3。生產投資減少了，多數資本轉向金融投機。

軍事獨裁政權是靠發展金融和銀行業來維持的。凍結工資並未能阻止通貨膨脹。減少政府預算赤字的結果是經濟發展減速。與1974年相比，1977年購買力下降了60%。

到了1983年，經歷長期軍事獨裁統治之後，羅爾·阿爾丰辛（R. Alfonsín）當選總統時，經濟狀況已陷於通貨膨脹、嚴重的衰退和巨額外債的絕境之中。

阿爾丰辛背著國際貨幣基金會採取一套經濟計劃，即有名的「南方計劃」（Austral Plan）。但完全沒有用處。在1984年，把國家的公積金全部用於償還外債。但外債卻以大於50%在增加。在同一時期，阿根廷的貨幣與美元的比值已降至1/50。利率高企使投資下降。1989年工業生產低於1974年。工資下降28%，為1945年以來平均數的35%，失業率達到15%。

實行私有化

1989年7月，貝隆主義者卡洛斯·梅涅姆當選總統。這時在全國三千萬人口中有900萬窮人。他加快國有公司私有化步驟。取消國家計劃，國家控制小麥、肉類和酒類市場的各部門予以解散，個人出口貿易活動得到特別的優待。在社會方面，政府撤銷了所有關於工資的談判。

私有化的結果是富者愈富。由於裁員和停產，造成大量失業。整個社會各階層陷於貧困境地——包括領取退休金的人，小學教師，政府機構的小官員。

經濟部長多明戈·卡瓦羅（軍事獨裁時期的前中央銀行主席）以固定阿根廷貨幣對美元的比率來降低通貨膨脹，收到一定效果（由1989年的49.33%下降到1990年的13.55%），這使梅涅姆贏得再次當選總統。但在他第二任期中，國家的經濟和債務比以前更為惡化了。

部長換了，困難依舊

1999年，另一位激進主義者費爾南德·德拉·魯阿當選總統。在他任期的兩年中，換了三個經濟部長。每一次更換都推出新的緊縮經濟政策來代替前任的政策。第一次政府僱員的工薪削減了8-24%，然後又削減13%。這第二次削減範圍擴大到250萬領取退休金的人。他們的消費每月是300比索以上。

但這些計劃並不能使卡死了的經濟得到鬆綁。在2001年末，外債已增加了三倍。公債已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現在的經濟完全依靠世界的銀行老闆的貸款來支持。唯一能夠解脫經濟困境的理智的措施就是暫時停止償還所有的債務。面對那麼多的外國和本國的資本集團，德拉·魯阿沒政治魄力採取如此激進的行動。

工業狀況壞透了。經濟衰退如此嚴重，在過去的一年裡，汽車工業僅生產18萬部，還不及生產能力的1/4。機器製造、紡織業，僅僅一個月，生產下降了20%。阿根廷經濟競爭力已從世界的53位下降到75位。

工人階級憤怒了

工業生產的下降帶來了失業。從2000年10月起，發生了失業者一連串不斷的抗議示威。他們的戰鬥行動得到青年、極左份子、工會積極份子的支持，也得到基督教會的支持。反飢餓遊行示威組織起來了。

作為90年代的標準，這些激烈的鬥爭接著一系列的起義和戰鬥，大多發生在失業者、臨時工和省市的公共部門的僱員中間。他們由於梅涅姆推行的政策的打擊，境況很糟糕。第一次起義發生在1993年在聖地亞哥的埃斯特羅。那裡的政府僱員襲擊一座公共建築物，抗議三個月沒發工資。在1995至97年間，同樣的起義發生在里奧尼格羅、內烏肯、薩爾塔及其他等地方，都構築了街壘。有的起義者被殺害，許多積極份子被逮捕。警察簽發的逮捕令達1800人。

在此期間，梅涅姆所採取的措施，引起勞聯會內部各集團相當大的反抗。貝隆主義佔支配地位的聯盟，分裂為三個組織，其中兩個仍保留勞聯會的名稱，另一個則稱做CTA。

CTA是一個小的聯盟組織，由維克多·德·格納羅領導。這個聯盟組織的主要成員是政府僱員聯合會（ATE），和公立教師公會（CTERA）。CTA自稱不受任何政治約束。事實上，它接近弗里帕蘇領導的中間偏左的小黨。這個黨隨後是德拉·魯阿聯合政府的一部份。

由羅多福·戴爾領導的CGT的一翼，是由CGT官僚的一部份人組成。這一翼CGT在答應德拉·魯阿的要求之後保持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由胡戈·莫雅努領導的CGT，包括有軌電車工人工會和貨車司機工會。這個組織最接近工人反對梅涅姆政策的觀點。

2001年的整個夏天，遍及全國的失業者試圖激發起全國性的運動。但他們祇依靠自己的激進行動，而沒有同在業的工人聯合起來。而正是在業的工人才擁有對資本家階級施加壓力的有效方法。

上述的三個工會聯盟體現了巨大的力量。在新近的反對緊縮政策的抗議示威中，他們動員了大批群眾到街上去，比失業者組織的抗議示威群眾還要多。兩個CGT組織的領導者不願意同失業者聯合起來鬥爭。他們拒絕從整個工人階級的需要來考慮問題。它們雖然有反對政府的共同利益，但在權力出現真空時，它們都不願讓工人階級填補這個權力真空。

社會動亂已經持續數月之久，工人階級十分不滿。許多工人意識到需要有一個真正的戰鬥綱領使在業的和失業的工人結成一個整體，對當前的局勢提出共同的答案。如果出現這一情況，工人階級一定會認識到，不管是貝隆主義的，或別的什麼資產階級政黨，對他們都不會有什麼幫助。他們也要學習區分在天主教會中，在政治家當中和在工會官僚中，誰才是真正關懷窮人的處境的。

要找到前進的道路是不容易的。唯一的就是鬥爭。祇有在鬥爭中把工人階級的各團體聯合起來共同戰鬥，才能擺脫國家的沉重債務和阿根廷資產階級的貪婪掠奪。

斯大林下令殺害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來論）

劉丹



〔1940年8月21日，斯大林派遣特務暗殺了托洛茨基，至今已過去了63個年頭，但一直不能阻止托氏思想主張的傳播。以下的文章，根據多種歷史資料，寫出了當時及這之前的實際情況，揭露出斯大林的殘暴無道，同時紀念這位與列寧一起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托洛茨基。——編者〕

斯大林認為托洛茨基是他競爭權力的對手。斯大林要取得國家權力，必須把這個競爭對手清除掉。故此斯大林對托洛茨基早就刻骨仇恨。

早在1923年，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結成「三駕馬車」期間，斯大林就想在肉體上消除托洛茨基。「三駕馬車」瓦解之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投到托洛茨基反對派，結成「聯合反對派」期間，1926年加米涅夫對托洛茨基說，斯大林「正在想怎樣來毀滅你，道義上的，如果可能的話，肉體上也是一樣。詆毀你，造一個陰謀集團；然後，一旦準備好了理由，就採取一個恐怖行動。斯大林正在指導這個從不同方面對付你的鬥爭，而你反對他的武器是不中用的。」

季諾維也夫對托洛茨基也說：「你是否有想過斯大林有沒有商議過從肉體上除掉你的問題？他是詳盡地考慮和商議過的，常使他躊躇未決的是他考慮到年輕的人們會把責任歸罪於他，並且會對他採取恐怖行動。因此，他首先把年輕人從反對派隊伍中分離出來。這個工作只是推遲，並沒有放棄。你還是保持必要的警惕好。」

1928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圖。在阿拉木圖期間，斯大林就想處死托洛茨基，但是考慮處死托洛茨基會遭到一部份政治局委員反對，並且可能激怒年青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可能會萌發出刺殺斯大林的念頭。而把托洛茨基驅逐出國，倒是一個辦法。托洛茨基由於在國外沒有同情者，沒有群眾，與親朋好友隔絕，生活無一孑A孤單一人，孤立無援，無所作爲。斯大林考慮再三，決定把托洛茨基驅逐出國。1929年1月18日，國家政治保衛局（克格勃）宣佈把托洛茨基從阿拉木圖驅逐出國。

1929年2月12日到達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安置托洛茨基居住在馬爾馬拉海中最大的普林吉坡島（土耳其名爲王子島，拜占庭時代，流放王子的地方）。托洛茨基一到普林吉坡島，立即就有各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來拜訪托洛茨基。中國的劉仁靜，在1929年6月間到普林吉坡島，拜訪托洛茨基，帶回托洛茨基爲中國寫的「鬥爭綱領」。來到普林吉坡島的有德國、奧地利、法國、美國的托派領導人和同情者、托洛茨基以前在歐洲結識的朋友，還有各國的黨派領袖人物慕名來拜訪托洛茨基；還有世界各國的大報記者來採訪。斯大林完全想錯了，托洛茨基並不孤獨，也不會孤立無援。相反的，托洛茨基到外國來更促進了各國托派組織的結合和發展。尤如一條困在泥潭裡的巨龍放入大海裡，立即得到在廣闊的大海裡暢游，充分發揮它的活力，在大海裡翻騰起伏，掀起巨大的海浪。

托洛茨基一到達普林吉坡島，立即開始寫作工作。1929年7月至1933年5月他寫了《我的生平》、《不斷革命》、《俄國革命史》、《蘇聯和第四國際》，開始提出建立第四國際問題。

最初開始時，是托洛茨基的大兒子謝多夫爲秘書，托洛茨基口授，謝多夫打字記錄，然後再翻譯成英文，拿去出版。稍後，有法國、奧地利、美國托派的志願者來爲托洛茨基當秘書和警衛員。

托洛茨基的老朋友阿爾弗雷德·羅斯麥和夫人瑪格麗特·羅斯麥，在1929年5月間來訪，在島上住了幾個星期。瑪格麗特富有，他資助托洛茨基出版《我的生平》和《俄國革命史》。這兩本書出版，托洛茨基得到一大筆錢。這筆錢一部份用來出版《反對派通報》，同時用於創辦諸如《真理》周刊的托派報紙；一小部份寄給西伯利亞的流放者。托洛茨基接受各地來採訪的記者而得到一筆錢，則用來支付生活費用。

在普林吉坡島上居住有白俄，爲了預防克格勃與白俄勾結來殺害托洛茨基，故此在白天除了一個土耳其警察之外，爲托洛茨基當秘書的志願者，同時也擔任了警衛工作。白天黑夜都有人警衛。

有一天，克格勃特工布魯姆金〈註1〉曾經是內戰時

訪托洛茨基，他對托洛茨基說，至少要有20個受過訓練的人，才能確保安全。可是那時四五個秘書，又沒有受過特殊訓練，只是盡力而為而已。托洛茨基委託布魯姆金轉交給莫斯科反對派一封信，信中斥責布哈林是特務分子。

1933年3月希特勒上台，托洛茨基認為改造共產黨無望了，決定建立新的黨，新的國際組織。從此，托洛茨基指導各國托派組織，組建新黨，在國際上組建第四國際。

斯大林看到托洛茨基的活動，對各國共產黨有很大的威脅，對共產國際起到破壞作用。蘇共通過共產國際指示各國共產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活動。1928年克格勃指示各國共產黨打入各國托派組織，進行破壞托派組織的活動。特務馬克·茲博羅夫斯基（埃延季）打入法國托派組織，成為謝多夫在巴黎的親密助手，謝多夫對他一點也沒懷疑，對他信任，把《反對派通報》與各國托派聯繫的地址交給他，由他做發行工作。還有亞伯拉罕·索波列維奇和魯文索皮列維奇（又名亞伯拉罕·謝寧，羅曼·威爾）兩兄弟。兄弟倆參加了德國托洛茨基領導工作和國際書記處工作。他們倆在德國托派中製造爭端，使德國托派毫無進展。

雅各布·弗朗克（又名格拉也夫），立陶宛猶太人，1929年春由維也納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夫人賴莎·阿德勒介紹給托洛茨基。1929年5月，到達普林吉坡充當托洛茨基秘書。他是奧地利的共產黨員，是克格勃的特務。1929年10月才離開普林吉坡。

1936年11月6日晚，克格勃竊取托洛茨基在法國存在米夏萊大街一個公寓裡的部份檔案資料。法國警方認定，這伙竊賊本領非同一般。克格勃是通過茲博羅夫斯基事先了解到米夏萊大街那個住所裡存放著的東西。

在1928至1936年間，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在國外對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行動，只是監視、委派間諜瓦解托派組織等。而從葉若夫時期開始，奉斯大林的命令，人民委員部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開始執行清除托洛茨基運動的領導人的政策。1936年12月，葉若夫組建了「特別行動處」由葉若夫領導，奉斯大林之命在國外搞政治謀殺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動。

共產國際委員會主席法國的安德烈·馬蒂，與路吉·朗格（加洛），祖澤別德·維多利奧（尼采萊蒂）、和東德人瓦爾特·烏布利希等人負責追捕國際縱隊中的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的托洛茨基分子。

1937年5月，西班牙當局奉斯大林命令，清除西班牙托派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尼恩被逮捕，遭到嚴刑毒打，他拒不承認一系列罪名，被活活打死。托洛茨基以前的秘書埃爾溫沃夫，被殺死。許多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普通成員，依據「共產主義法庭」判決，被非法槍決。

從馬克·茲博羅夫斯基得來的情報，西歐一名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波列茨基秘密與荷蘭托派亨利克·斯奈弗利揚接觸，於是內務人民委員部派人到巴黎，把此人殺掉。1937年11月4日波列茨基布滿彈孔的屍體在瑞士的公路上被發現。警方在殺手所遺留下的箱子裡，發現有一張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科亞坎住宅的平面圖。這說明克格勃已在

計劃襲擊托洛茨基了。

內務人民委員部定下三個人為主要目標：托洛茨基之子謝多夫；將被任命為1938年第四國際書記處書記，當時為籌備召開第四國際大會的負責人魯道夫·克勒門特；托派領導人列夫·托洛茨基。

1938年2月8日，謝多夫闌尾炎發作，馬克·茲博羅夫斯基說服謝多夫去俄國僑民辦的診所做手術。茲博羅夫把謝多夫送去診所後，立即告知內務人民委員部（後來是他自己承認的）。謝多夫當晚就做了手術，幾天後有所好轉。來看謝多夫的只有伊娜（謝多夫的情人）和茲博羅夫斯基。2月13日病情突然神秘地惡化。醫生對謝多夫的病情十分震驚，問伊娜，會不會他自殺。伊娜聽了他的話，突然哭起來。她說可能是特務對他下毒藥。2月16日，謝多夫痛苦地死去。顯然正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做了手腳，促進他死亡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當時有一個用藥物和毒藥進行試驗的醫學小組，名叫「暗室」。很難想象，當茲博羅夫斯基把謝多夫騙到去那個可能已潛伏有特務的診所之後，會不下毒手害他？

謝多夫一死，茲博羅夫斯基接手了《反對派通報》的出版工作，並與那些從蘇聯逃出來與托洛茨基聯繫的人進行聯繫。他玩弄陰謀，使托洛茨基和斯奈弗利特發生爭吵，並使托派內各派之間已有分歧火上加油。托洛茨基對他毫不懷疑，當斯內弗利特懷疑他是特務時，托洛茨基就寫信給他：「你想剝奪我與別人合作的權利。」請中傷他的人，向獨立委員會提出證據。

1938年7月13日，為第四國際成立做準備工作的克勒門特在巴黎自己住宅中神秘地失蹤。不久，在塞納河畔發現一具無頭屍體。兩個法國托派分子根據死者身上特有的疤痕認出是克勒門特。

1937年斯大林下令施皮格爾格拉斯幹掉托洛茨基，但遭到失敗。1939年3月斯大林召見貝利亞，貝利亞帶著帕維爾·蘇多普拉托夫去見斯大林。斯大林再次下令刺殺托洛茨基，這次刺殺務必成功。蘇多普拉托夫接受這項任務，並被任命為內務人民委員部情報局副局長。



蘇多普拉托夫找來璦姆·亞歷山德羅維奇·艾廷根（列昂德尼）來執行這個刺殺托洛茨基的行動。這個行動代號為「鴨子」。艾廷根以墨西哥共產黨領導人畫家大衛·阿爾法羅·西奎洛斯特來組織對托洛茨基住宅的襲擊。

1940年5月，墨西哥城大街上有兩萬名共產黨員和群眾舉行遊行，高舉著「托洛茨基滾出去！」的牌子。托洛茨基預感到會對他住宅的攻擊，於是立即對圍牆加固，並將臨街的窗戶封閉。

5月23日四時左右，二十多個身穿軍服和警服的人，在大衛·阿爾法羅·西奎洛斯的率領下來到托洛茨基住宅前，西奎洛斯坐在住宅外的汽車裡，裝上假鬍子，戴黑眼鏡，指揮及接應武裝人員。當夜警衛是美國人謝爾登·哈特，被他認識的墨西哥人騙得開門。門一開，二十多人拿著機槍、手槍，衝入屋內，向托洛茨基的臥室門外開槍掃射。托洛茨基夫婦隨之滾下床，躲在床下，掃射了一輪就撤走了。西奎洛斯在屋外駕著汽車載著他們逃走了。托洛茨基沒有中彈，只是擦傷了手。第二天，哈特被發現綁在樹上，已被殺死。

警察逮捕了幾名武裝人員，審問他們，供稱是由西奎洛斯組織及指揮的，要殺死「人民敵人」托洛茨基。西奎洛斯早已由克格勃設法逃往外國。

這次突擊失敗，艾廷根進行第二個刺殺計劃。小組的代號為「母親」。組長為卡里達德·梅爾·卡德爾，她和她的第二個兒子拉蒙在西班牙就被艾廷根吸收為蘇聯特務。1938年，拉蒙被派往巴黎，化名雅克斯·莫爾納德，比利時外交官的兒子。9月，拉蒙·梅爾·卡德爾由盧安諾兄弟介紹認識當時在巴黎的美國人西爾維亞·阿奇洛夫小姐和羅斯麥夫婦，克格勃指示拉蒙向阿奇洛夫求婚。拉蒙生得年少英俊，立即得到阿奇洛夫接受了他的求婚。阿奇洛夫是巴黎托派成員，托洛茨基的秘書。

拉蒙取得阿奇洛夫的愛情，他就有機會接近托洛茨基。他遷到墨西哥與阿奇洛夫同居，他每天上午駕車送阿奇洛夫去托洛茨基的別墅上班，下午駕車去接阿奇洛夫下班。但他從來不走進托洛茨基的內屋去，只去見居住在外屋的阿斯默夫婦，為阿斯默買花，或者送些小禮物；或者為阿斯默辦事。阿奇洛夫也從來沒有帶他進入到托洛茨基的內屋。有兩三次在院裡見到托洛茨基，有禮貌的和托洛茨基點點頭，寒暄幾句就走開了。有一次他送給謝瓦（托洛茨基的外孫）一個滑翔的飛機玩具。娜塔麗婭，根據托洛茨基的暗示，邀請拉蒙和羅斯麥夫婦同進早餐。由於他經常來，警衛人員也見熟了，混熟了。

艾廷根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了，就和拉蒙商量使用什麼武器好。用槍有聲響，會驚動警衛，最好是用刀或斧頭，這些武器容易收藏，不易被人發現，而且沒有聲響。於是決定用登山斧子。同時，他們商量好，這次行動要把托洛茨基搞臭：如果拉蒙被捕，他說托洛茨基反對阿奇洛夫與拉蒙結婚；托派把他捐獻的資金用於個人享受；托洛茨基要他參加恐怖組織，謀殺斯大林及蘇聯其他領導人。

8月20日下午，拉蒙帶了自己寫的文章，來請求托洛茨基批評並修改。他手裡拿著雨衣（天並沒有下雨），登山

斧就藏在雨衣裡。衣袋裡還藏有一把手槍，萬一斧子沒有把托洛茨基砍死，就開槍把他擊斃。當托洛茨基埋頭看他的文章時，他從雨衣裡抽出登山斧，用盡全力向托洛茨基的頭部砍去，托洛茨基大叫一聲跳起來，死死地抓住拉蒙，拉蒙慌了手腳，不知所措。警衛員聞叫聲和娜塔麗婭衝進來，警衛立即打倒拉蒙，用槍托打他，在他衣袋裡搜出手槍。斧子還砍在托洛茨基頭上。立即呼救護車把托洛茨基送去醫院搶救。斧子深砍入腦裡，腦部受到嚴重破壞。

在醫院裡托洛茨基要漢森記下他的話：「由於一個政治殺手重擊，我就要死了……我同他搏鬥……請告訴我們的朋友……我堅信……第四國際……必勝！……前進！」。

由於他傷勢過重，醫治無效，8月21日下午7時25分逝世。

8月22日，按照墨西哥的習俗舉行送葬儀式。長長的送葬行列尾隨靈柩，在市區主要街道上緩緩行進，人行道上擠滿人群。美國托派組織要求將遺體運去美國安葬，但國務院拒絕簽證。

遺體在住宅陳列5天，大約有30萬人去瞻仰。大街上有無名詩人創作的民謠《列夫·托洛茨基大門牛》、「托洛茨基在夜裡被人殺死了，有人要為他報仇！」。

8月27日，遺體被火化，骨灰就安葬在科約坎住宅院子裡。墓前樹起一塊長方形的石碑，石碑刻有鐮刀斧頭，墓碑上飄著一面紅旗。

拉蒙被捕後，就按照原先擬定的供詞來說明他刺殺托洛茨基的動機。阿奇洛夫作為同謀犯被捕，經查明她與此事無頭，她是受蒙騙，是受害者，無罪釋放。有兩三個秘書被捕亦無罪釋放。拉蒙被判20年關禁。

20年後，拉蒙釋放。先在古巴住一個時期，及後去蘇聯。蘇聯授予他「蘇聯英雄」稱號。1978年在古巴逝世。

2003年1月6日

本文取材自下列書籍：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托洛茨基《流亡日記三種》香港戰訊出版社，

〔法〕讓·范·埃熱努爾著張敏梁譯《托洛茨基流亡生涯》，

〔蘇〕帕維爾·蘇多普拉托夫《情報機關與克里姆林宮》，

王銘玉等編《克格勃全史》，

〔波〕伊薩克·多伊切著《流亡的先知》，

〔美〕琳達·勞賽拉編寫，高哲民等譯《政治謀殺》，

《中外名人之死》，江蘇人民出版社。

註：1布魯姆金回到莫斯科後不久被捕，說他見過托洛茨基，接受托洛茨基命令，組織馬克思列寧主義黨，被判刑，及後，被槍斃了。

《對抗經濟全球化的可能選擇》評介（來論）

趙京



經濟學是各國的熱門專業，所謂「經濟政策」包括許多本來屬於政治、社會、法律領域的課題，其運用研究甚至成為帶動數學、統計學發展的動力，但是，不存在對立學派的經濟學日益墮落成爲市場（金錢）服務的婢女。例如，美國勞工部所使用的失業率，既不包括許多想工作卻無法進入勞動市場的人，也不包括那些半年至一年後喪失領取失業保險資格的人。所以有些激進的美國人士一概反對用任何官方（或主流派）經濟學數據說明問題。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通過比較，從官方的數據中看出變化。例如，勞工部公布今年五月份的失業率是 6.1%，雖然此數值嚴重偏離現實，但我們仍然可以通過此數值知道它是九年來的最高值，可想見美國經濟之衰退。而世界高科技中心的硅谷（聖塔·克拉克縣）更是首當其衝，所謂的失業率高達五分之一。加州各級地方政府都陷入財政危機。與整個美國的情況相同，除了軍事警察、消防部門，所有教育、社會福利、公共服務等部門全面削減。美國的普通民眾現在切身感到：所謂全球化，不僅是對第三世界的剝奪，也是對美國中、下層民眾的榨取。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聖塔·克拉克縣的一些政府部門人士（其中有人已經被解雇）和非牟利

組織人士（包括筆者）組成「人間議程」（Human Agenda），力圖通過自我教育、公共教育來試圖改進硅谷、加州和美國所面臨的問題。在關注、參與現實社會（如福利、交通、移民）的同時，我們很迫切希望能在理論上找到一些線索。因爲所有的學術界幾乎都被財富和權力壟斷，雖然民眾的反對在西雅圖、熱諾亞等地表現無遺，卻沒有研究者比較系統地提出可能的對抗性選擇。

人間議程的Hobbs律師（縣社會服務部移民處處長）爲大家找到由「全球化國際論壇」（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編集的《對抗經濟全球化的可能選擇：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一書（由舊金山的Berrett-koch Publishers公司2002年出版）。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關於全球化的最及時的總結和評述，值得向大家推薦。

全球化國際論壇由二十五個國家地區的六十個組織構成，自一九九四年成立以來，它們參與幾乎所有重大的反抗運動。此書由十九名活動家、學者用三年時間編集而成，共有八章：一、全球公司化批判，二、可持續社會的原則，三、公共財產，哪些領域不能憑全球化擺弄？四、可持續性，擺脫全球化的偏見，關注當地，五、公司法人的結構與權力，六、另一種操作制度，七、告別不列通伍德（Bretton Woods）制度，八、結論。

此書編、作者們在批判經濟全球化的同時，進一步驗證了全球化的支配意識形態，揭露其經濟和環境上的弊端。他們具體地提出代替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貿易組織等機制的方案，促進民主、基本權利和生態持續性；提出政策性建議，重新確立符合人間生活需求的能源、農業、食品、交通以及製造業方面的經濟操作制度；探討如何限制公司的特權和濫用；展示基本公共物品和服務（如用水）必須禁止私營企業的競爭和控制；提議事關當地民眾生活的經濟決策必須盡量由直接受影響的人們決定。

此書的最大優點是提供大量平常不易想像的信息和事實。例如，關於企業的「法人」地位，此書告訴讀者，正是在1886年的一場聖塔·克拉克縣政府對南太平洋鐵道公司的官司中，最高法院判決公司享有與人同樣的權利，從而迫使數百條公司法規作廢或改變，賦與公司甚至比自然人還多的權利。試想一下，如果公司的股東和管理階層必須（像人一樣）對公司經營擔負直接責任，就沒有可能發生安龍那樣的企業醜聞了。

此書提到外地（甚至外國）保險公司支配當地醫院、學校的威脅也是今天的現實。當地聖荷西市中心唯一的綜合醫院被紐約的一家公司收購後，立即被決定搬出較貧窮的市中心，移到已經有八所醫院的市郊。雖然連國會議員、市長等各界人們都要求把醫院留在市中心，但也無濟於事。因為在紐約的公司股東、董事們才有決定權，而他們關心的只是利潤，不是聖荷西市民的健康。

此書對於反對全球化的人士也是一個鼓勵，

它告訴讀者：在世界各地正發生著類似的事件，受害者不只是局部的某一階層；同時各處的反抗運動、形式也多樣豐富，可以互相借鑑、學習。如果說要指出不足之处的話，此書在操作性層次上如何有效地對抗全球經濟，仍然需要加強。不過，這可能需要另一本書的研究努力了。

2003年6月8日

（上接第33頁）

<24>見1966年12月號及1968年6月號的《Das Argument》[《爭論》]上Tim Masun 與Eberhard Czichon之間的討論。

<25>Albert Speer，希特勒政府的軍火生產部部長，是德國大資產階級的一位直接代表。他可能對在這情況中說服希特勒有影響作用。

<26>Guerin 的《法西斯主義與大企業》對這事有詳細的討論。

<27>注意以下這點會引起興趣的：德國國防軍要看共產黨對1933年1月納粹衝鋒隊在其總部門前的挑撥性的示威遊行的反應之後才決定支持希特勒被提名為國務總理。同樣地，根據皮諾切將軍在他的政變成功之後所作的談話，他只是在研究了工人階級各群眾組織對1973年初（聖地牙哥裝甲兵團）失敗了的政變的被動態度之後，才得出推翻阿蘭第政府不會有嚴重風險的結論。西班牙資產階級嚴重地誤算了1936年的局勢，以為法西斯主義的軍事政變會是輕易之舉。因此，它幾乎在這個國家的大部份地方失去統治權。一半的將軍們失去了生命。

<28>August Thalheimer 的《Über den Faschismus》[《越出法西斯主義》]1989年漢堡版。

<29>在1930年代，托洛茨基對波拿巴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問題寫了多篇文章。最重要的一篇是“波拿巴主義與法西斯主義”（1934年7月15日）。此文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 1934-35年》，1977年紐約版，第51至57頁。

<30>在災難性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的錯誤之後，德國共產黨在1933/34年，在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失敗之後，開始鼓動群眾起來行動。

<31>意大利的Gladio醜事是一個好例子。在這同時，我們也聽到西班牙Tejeio少尉在1981年所企圖發動、明顯是胡鬧的暴動，事實上是由大部份陸軍將領所支持的。

<32>見《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第141頁。

<33>關於“社會法西斯主義”這個過左理論的悲慘結果的詳細證據，可在Theopirker 所著的1961年Stuttgart版的《Komintern und Faschismus 1920-

1940年》[《共產國際與法西斯主義1920-1940年》]一書中找到；也可在Herman Weber為 Ossip K.Flechtheim 的《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魏瑪共和國中的德國共產黨》]（1969年法蘭克福版）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找到。

<34>見Otto Braun 著的《Von Weimar zu Hitler》[《從魏瑪到希特勒》，紐約1940年版。]

<35>現在有大量文件證明，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願意與共產黨的工人聯合起來，共同抵抗。

<36>例如，在末期巴伐利亞的首相Hoegner 的回憶錄中。

<37>見（Rodolf Hilferding）在《Die Gesellschaft》[《黨》]，1933年第一期上的文章。

<38>托洛茨基在《西班牙的教訓》（1936年7月30日）一文中詳盡地討論了軍官團對右翼保守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該文收集在《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1939》[《西班牙革命，1931年至1939年》]，從第234頁開始。

<39>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冊子《Whither France》[《法國往何處去》]中分析了法國在1934年到1936年之間的发展。該書由尋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於1968年在紐約出版。

<40>見《西班牙革命，1931年至1939年》。

<41>關於對托洛茨基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角色的評價，除其他資料外，見Baruch Knev-Paz 著的《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托洛茨基的社會和政治的思想》]，1978年牛津版第354至355頁。

<42>例如Isaac Deutscher（伊薩克·多依徹）著的《The Prophet Outcast》[《流亡的先知》]，1970年牛津版；Monty Johnstone 著的《Trotsky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托洛茨基與世界革命》]，在《Cogito》[《自我思想活動過程》]，1976年，第10至14頁，I.Howe 著的《Trotsky》[《托洛茨基》]，1978年倫敦版。

《權力與貨幣》書評

(來論)

劉丹

《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

厄內斯特·曼德爾著

孟捷、李民祺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

曼德爾的《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有關）官僚理論》，以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來系統地全面地論述官僚的成長，蘇聯官僚階層、官僚政治經濟對蘇聯的禍害，消滅官僚的道路，和沒有官僚存在的未來社會。可以說，這是首屈一指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論述官僚的著作。

曼德爾首先申明，本書所要分析和所要解決的問題。他說：「東歐政權為什麼會垮台呢？我們可以明確地回答：是由於官僚集團對權力的篡奪，是由於這個集團政治基礎的瓦解。問題不在於掌握權力的人腐化變質了或受到錯誤思想的影響，而在於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等力量的相互作用。本書所要分析的就是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第3-4頁）「為什麼會出現蘇聯和東歐這樣的悲劇？它的深刻的歷史根源是什麼？怎樣防止悲劇重演？社會主義事業還有沒有前途？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覆亡了，社會主義還能幸存嗎？沒有一個系統的關於工人官僚的理論，也就是關於從工人階級的組織和國家中產生出來的官僚的理論，就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這些問題。這正是本書要解決的問題。」（第7-8頁）

因此，書的重點是評論官僚層政治經濟及蘇聯解體所引發出的問題。

首先，曼德爾論述「工人官僚的起源」。在資本主義社會，機關的發展，使工人組織進行社會的分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隨著由專業幹部組成的機關的產生，就出現了工人階級自身分裂為執行不同職能的不同階層的危險。「專業化會導致日益增長的對知識的壟斷和信息的集中。知識即權力，對知識的壟斷導致對人的統治。所以，官僚化的傾向如果不受阻止的話，將會導致出現新的統治者和被統治的群眾之間真正的分裂。」（第75頁）

無產階級幹部層，是處於萌芽中的官僚，傾向於一個獨立的階層，是不可避免的嗎？曼德爾說，是可以避免的。「工人階級的集體組織同時也是個人實現自我解放的渠道。」（第76頁）

至於蘇聯工人官僚的形成過程，曼德爾分析道：「起初只是特殊的權力和權力壟斷而產生的政治利益，然後是帶有物質性和文化性的社會經濟特權，最後，是完全的蛻變。黨——國家的官僚與經濟管理的官僚融合在一起，成為一個硬化的、不可變更的社會階層。它利用它的權力壟斷來維持

和發展它的物質——社會地位。工人官僚掌握著國家政權這一事實，把所有的群眾性工人組織和工會和黨的官僚機構中所能觀察到的反工人階級的、保守的和寄生的特點都十倍地擴大了。」。（第96頁）最初，共產黨的幹部是民主選舉產生的，後來卻由中央書記處斯大林任命，於是被納入一個忠於黨的書記處和總書記斯大林、並由斯大林授予工作崗位的委託代理機構。就這樣形成了斯大林官僚集團。官僚集團享有物質的特權，高薪俸（1924年已達到工人的平均工資的10倍）、特殊商店、別墅、特別醫院、特別療養院、高級食堂，等等。

官僚政制使黨內沒有民主，國家沒有民主。黨員有意見不敢說，人民有意見不能說，斯大林獨裁統治之下，窒息了一切民主、自由。

代替官僚政制是「以非資本主義方式替代官僚主義主觀臆斷的抉擇只有一個：那就是工人群眾自己集中分配資源、並以民主方式決定資源的配置優先權的管理和計劃制度。這樣一種制度要求群眾作為生產者、消費者和公民表達自身的需要——也就是說，他們控制他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從而從官僚制和市場（金錢暴政）的專政主義中同時解放出來。

「但是，這種解放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整個過渡時期，自覺的、民主的計劃與市場機制的利用將同時存在。」

「只有這樣，才能在實踐中克服官僚集團不負責任與無能。對生產和需要之間的關係的合理解決辦法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前提的——對經濟的自我集中管理，是由工人自己來計劃和施行的。而這只有在商品生產不起調節作用並且在長期內逐步消亡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第61-62頁）

要做到「非資本主義方式代替官僚政制」，首先必須恢復民主制度，恢復民主自由的選舉，恢復民主集中制。列寧極力主張委派制、集中制及一長制。在蘇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提出禁止黨內派別活動。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反對委派制、集中制和一長制，多次提出要恢復民主自由選舉，恢復民主集中制、恢復集體民主管理、恢復黨內批評自由；可是，這些建議被黨代表大會以列寧為首的多數派所否決。（參見《「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對派」文選》）曼德爾指出，在戰爭勝利後，卻限制了民主，「在我們看來，對列寧和整個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悲劇性錯誤，托洛茨基在這方面也難辭其咎。」（第145頁）

曼德爾認為，蘇聯還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蘇聯是一個過渡性質的社會。「蘇聯社會滯留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階段。它既可能退回到資本主義，也有可能前進到社會主義——如果

官僚集團的權力在政治革命中被推翻的話。」(第3頁)

當托洛茨基第一次提到在蘇聯發生一場反官僚政治革命時，在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及左翼人士中，對這種政治革命的可行性表示懷疑。曼德爾回答說：「歷史如今作出了裁決，這個裁決極其有力地支持了托洛茨基的觀點。在1965年10-11月的匈牙利，1968-196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80-1981年的波蘭，以及1989年的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一場真正的政治革命真的發生了。」(第237頁)

「反官僚政治革命的可能性取決於幾項條件：制度性危機的深度及其爆炸性；勞動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與官僚尤其是上層官僚之間的對立的程度，各主要階級及其內部集團之間的力量關係；上層官僚為鞏固自身統治進行自我改良的能力。」以上四種因素會產生出四種不同的結果：

(1) 反革命在全社會的勝利(資本主義復辟)；(2) 官僚的自我再生產得以延續，但是會使危機拖延下去，並出現進一步的解體；(3) 官僚進行根本性的自我改革；(4) 反官僚的政治革命的勝利。(第238頁)

在這些可能出現的結果中，至少有兩種結果已由歷史作出了明確的裁定。制度性危機的深刻性是不可否認的，工人階級和上層官僚之間的敵對性甚至比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料想的還要嚴重。官僚進行自我改革的狹隘局限性從鐵托、赫魯曉夫得到證實，為戈爾巴喬夫的實驗所證實。「由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公開性進程所得出的基本結論在於，除非一場『來自下層的革命』取代了『來自上層的改革』；否則，要想消除龐大的官僚機器為改革設置的障礙是不可能的。」(第238頁)

為什麼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東德、羅馬尼亞所爆發的政治革命都失敗了呢？曼德爾解釋道：「在今天的條件下，以一次勝利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主義專政只是一種可能性，有可能由於資本主義復辟的得逞而不能實現。如果考慮到無產階級、官僚集團和親復辟勢力之間在客觀上的力量對比關係，那麼在俄羅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於羅馬尼亞和波蘭，工人階級都有很大的力量。但在這些國家中，工人階級正在被動員起來，他們的活動在增長；但是，要進行一次勝利的政治革命，工人階級還必須具備高水平的階級覺悟，和自我組織能力，有能力擔當政治的領導力量，明確地提出工人階級在權力方面的要求。這些條件，現在在東歐各國還不存在，在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存在。」(第5-6頁)

既然，東歐各國和蘇聯的工人階級還沒有能力進行一次政治革命取得勝利，那末，蘇聯和東歐各國，只會走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現在，在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可以看到，官僚集團的一部份正在轉變為一個資本家階級。」(第40頁)在蘇聯後期，「在它的內部，相當一部份勢力已準備與國際資產階級相勾結了。」(第5頁)當到了政治氣候適合於官僚集團內資本主義傾向者公開活動時，他們就立即脫下共產主義的外衣，穿上資本主義的錦袍，進行資本主義復

辟。我們已看到了，東歐各國、蘇聯解體後所建立的各個共和國，那些政府首腦和政府官員都是過去的共產黨幹部，蘇聯官僚集團的人物。

《權力與貨幣》最後一章是「自治、豐裕和官僚的消亡」，詳盡地描繪社會主義社會的全景。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只描畫一個輪廓、一個框架，而曼德爾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作出詳盡的全面的描繪，是補上了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的一個空白。我們在這裡不作介紹了，讓讀者仔細的去領會吧。

譯者在「譯者前言」中，批評曼德爾的理論觀點有自相矛盾地方，「他一方面認為革命後官僚集團僭取了工人階級的權力，另一方面蘇聯型的過渡性社會也存在著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突進的可能性；他在這兩種觀點之間搖擺。」(譯者前言，第3頁)

譯者批評所指的是曼德爾這句話：「蘇聯滯留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它既有可能退回到資本主義，也有可能前進到社會主義——如果官僚集團的權力在政治革命中被推翻的話。」(第3頁)

這是毫無矛盾的。按照官僚政制和經濟政策的自然發展，是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只有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的統治，工人階級重新掌握政權，改變官僚政制和經濟政策，才會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

蘇聯存在有發生政治革命的可能性，但並沒有爆發政治革命，故此，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復辟。

最後，談談譯文的問題。譯文是流暢順達的，但是有刪節。兆立先生把譯文與原著作了粗略的對照，發現有多處被刪除掉。例如：

第5頁，第2段，「但是在今天，蘇聯官僚集團」之後，有一句「like the Chiness (像中國官僚層一樣)」。被刪除了。

第10頁，第3段末「已經為新社會的構成要素準備了雛形」，之後，有「Sociclist vevolution essentially means the setting free of these constitutite elements。(社會主義革命必不可少地意味著釋放這些構成要素。)」被刪除掉。

第11頁，末句「在那些仍舊受著斯大林主義束縛的國家」之後，有「like China (比如中國)」。被刪掉。

第237頁，第2段末，「一場真正的政治革命發生了。」之後，有「An embryo of one has emerg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一個政治革命的萌芽期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了。)」被刪掉。

我們想，譯者把這些文句刪掉，也許是爲了使譯文能通過出版社審稿而這樣做的吧。這些文句被刪除對原著的主題、主要觀點沒有什麼影響，只是使原著的論述不夠全面吧了。

凡是關心現在社會發展的前途及未來新社會的人，應該閱讀曼德爾的《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這本書。

2002年8月27日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十)

曼德爾著 兆立譯



第七章

托洛茨基的反法西斯主義鬥爭 (下)

大企業與法西斯主義

將政權移交給法西斯主義政黨的方案一直在資產階級份子中引起不和及懷疑。它從來不是一個平滑的運作。這個區分是與資產階級內部經濟、政治和思想的分層相稱的。我們可以定出這樣一個命題：直接製造大眾消費品的那些部門比較不太願意公開支持、資助法西斯份子奪取政權，而大的、重工業和製造軍火和生產資料的那些部門則比較願意考慮這樣一個步驟。

屬於後一集團的，在德國有：大化學工業，特別是IG-Farben，鋼鐵及礦冶公司，大多數的大銀行，特別是德意志銀行。但是電器、紡織及製衣工業等屬於前一集團。〈19〉雖然這個命題有時被應用得太機械，但是它有單憑經驗的強烈依據。不同的政治目標局部地被不同的物質利益所決定。紳士俱樂部（Herrenklub）在提名希特勒為國家總理的事件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眾所周知的。奧斯蒂弗醜事是一個重要的因素。〈20〉

但是比這個事態的一一區域性的外表更重要的，是關於以下這個可能性在政治判斷上的分歧：為了大企業的利益真正控制這個明顯是軍事冒險家的希特勒的可能性。有些人持懷疑態度，有些人則不。在巴本胡根堡周圍的保守派、甚至以後的無所不包的中央黨都相信，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判斷顯然是錯了。

我們不應該忘記，資產階級的整個歷史，一直是以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這個歷史性分歧——從法國大革命、如果不是從更早時期開始即有的分歧為特徵的。在這個分化過程中，由於各種必須在每一個情況中加以具體分析的理由，有時候這個派，有時候那個派，佔上風。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自由派在德國是主要派系，保守派則在法國。但是，二十世紀初，有了一個變化。在法國，勝利的是，德雷福斯的擁護者；而在威廉大帝的德國，日漸佔據中心位置的是，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保守主義。希特勒之走上政權，一部份是這個保守主義的繼續。這個保守主義，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它的失敗和凡爾賽和約之後的復仇主義而勢力大增。它已在哈爾茨堡陣線中被預料到。〈21〉可是，它並不是沒有中斷的、而是充滿了懷疑和自我懷疑的連續。它不但導致1933年1月30日，也導致1944年7月20日的事件。〈22〉

不管怎樣，將資產階級內部所有這些層份、集團聯合起來的是，他們在保衛財產、保護資本積累自由和保證資本增值上的共同階級利益。在這個平面上，法西斯主義的決算表是清楚明白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徵，不但保持著，而且鞏固了。它們能夠前所未有地自由發展。

從經濟上看來，第三帝國是獨佔資本不受約束的統治。在經濟上看起來是國家“干涉”的東西，十分之九是以加強獨佔資本的自管為目的的措施，包括支持大企業在掠奪性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期中使較弱商號嚴格遵守紀律的措施（強迫組成卡特爾）。〈23〉納粹絲毫沒有奪走大企業的經濟權力。關於在第三帝國中是“政治佔首位”還是“經濟佔首位”這個無休止的討論，我們看到了神秘化的因素。〈24〉有意或者無意地，所謂精英份子對於納粹主義的罪行應該有罪這個無可改變的歷史，現在不是被降低其重要性，就是被否認。我們在這裏所指的，不是無足

輕重的同路人，不是在最好的情況下閉上眼睛，或者在最壞的情形下明知其有罪而無可奈何去合作的“靜默大多數”。我們在這裏所指出的是，銀行家、工廠主、大商人、軍隊將領、高級公務人員、法官、律師、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等的關係重大的責任。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不但“容忍”或“附和”納粹主義，而且懷著絕對是具體、明確的階級利益和目標，設計、介紹、指導、領導和在思想上掩護這整個過程。

只有在這一個場合中希特勒試圖強加他的意思，反對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戰爭的末期當他要破壞他們的工廠的時候。他沒有成功。〈25〉極權主義的論點，即使以最合邏輯的形式出現，也抵擋不住歷史的證據。極權主義獨裁制從來沒有成功地控制、更不必說消除資本的獨立的經濟利益了。

托洛茨基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幫助我們了解：為甚麼在第三帝國這個例證中，法西斯獨裁的各矛盾因素會有以下的綜合：懷著鞏固獨佔資本的經濟權力和保證資本的增值這兩個目的，暫時奪走獨佔資本的政治權力。這就是歷史對於政治佔首位抑是經濟佔首位這個機械的對立立場的回答。

法西斯主義與工人階級

我們剛剛說過，資產階級可以在法西斯團伙的幫助下，試圖消滅資產階級民主制。但是，一個法西斯政權的建立，並不單單依靠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內部所發生的事情。它也依靠工人階級內部所發生的事情，換言之，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反應。

與各元首候選人可以大量吸收的“人類流沙”相比，近代工人階級，在所有工業先進國家，都具有巨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權力的潛力。社會上所有創造的、生產的功能，統統集中在這個階級或與它有密切聯繫的各社會層份上。在大多數的這些國家中，工人階級的文化的、政治的群眾組織，都非常活躍，在許多國家中，直至1920年代末或1930年代初。這些群眾組織團聚了數以十萬計的，如果不是數以百萬計的能夠熱誠地為他們的共同階級利益而戰鬥的工人。在所有這些國家中，還有巨大的、強大的工會，這些工會不但有力量癱瘓資本主義經濟，而且具有癱瘓資本主義國家本身的潛力。

與這樣一個強大反對力量較量，資產階級高層的有階級意識的代表們，為了以上所敘述的各理由，不但必須認為他們自己沒有其他道路可走，而且必須相信他們在這個巨大的力量較量中，至少有從中殺出一條生路的機會。沒有這個力量較量，破壞資產階級民主制以乎是不可能的。在這些計算中的任何錯誤，對社會力量關係的任何錯誤估計，都會帶給資產階級災難性的後果。從個人以及社會的觀點來看，那可能等於自

殺。1936年6月巴塞羅那、馬德里、巴倫西亞和馬拉加等西班牙城市所發生的事件就是重要的實例教訓。〈26〉

在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日漸增加的時期中，但是在法西斯主義者奪取政權之前，獨佔資本主義的各重要領導人非常注意工人階級內部和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內部在對付這個法西斯的威脅時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事實上，他們對變化中的力量關係的分析，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有許多共同點，雖然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

每一個可在工人階級中見到的聯合的、強大的抵抗運動的跡象，每一個朝向群眾的武裝自衛行動的指標，每一個逐漸願意以堅實的決心來保衛他們自己抗擊法西斯野獸的跡象，都會增加獨佔資本對於是否應該測試力量的猶豫和懷疑。

同樣地，在工人階級中的任何分裂、被動或順從的跡象，在法西斯主義者方面的每一個沒有遇到抵抗或反擊的策略成功、群眾組織的領導不管用詞多美最終都會向法西斯主義投降的每一個跡象，群眾不能夠對法西斯威脅自發地發動反擊的每一個跡象，都會使獨佔資本相信，為改換政權所付出的代價，會比它所預測的要小得多。這些軟弱的跡象，會加速法西斯主義者奪取政權的進程，因為那會證明，內戰將會是單方面的事務，而工人階級的失敗將會是壓倒性的、長久的。〈27〉

因此，極其重要的是，要從法西斯主義的開始，就以一種堅定、聯合、有力的反應，就以一個保衛工人階級的自由組織、罷工權和所有其他民主自由的鬥爭，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沒有這種反應，沒有這個鬥爭，工人階級會在一整個歷史時期中，被決定性地削弱。

這樣一種聯合的、堅定的、有力的反應會在這個國家裏觸發一次會改變整個政治氣候的連鎖反應。它會使小資產階級更懷疑法西斯份子是否真正會贏，因而使他們的群眾基礎變弱，增進將重大部份的中產階級中立化的機會，如果不能真正地將他們爭取到工人階級的事業和社會主義這一邊的話。可是，要實現這一點，工人們需要把這些社會層份的利益考慮在內的綱領。工人階級必須讓小資產階級感覺到，他們真的要創立一條有別於法西斯主義對於政權問題的解決方法的通路。

資本家們本身也會通過慘痛經驗學習到，投資在法西斯團伙身上的資本根本得不到任何贏利，只預示重大損失。他們對法西斯主義的解決方法的支持，會轉移到幕後，而且不再是他們的政治遠景中的重要因素。至於工人階級，每一次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鬥中的策略上勝利，都會鞏固它的隊伍內部的團結，增強它的戰鬥精神和決心。他們對自己命運的信念，他們對社會主義之作為解決正在震撼這個國家的社會危機的可供選擇辦法的信念，將會繼續增長。這種做法，才

會為一個強大的社會、政治的反攻打好基礎。這樣一個強大的社會、政治的反攻才能夠很快地將社會主義革命提上議事日程。

所有這些際遇與機會都要靠工人階級的團結和政治獨立。如果這個階級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如果社會民主黨人與共產黨人（斯大林主義者）彼此鬥來鬥去而不把他們的隊伍聯合起來抗擊法西斯份子，如果共產黨人（斯大林主義者）相信他們一定要打敗社會民主黨人才能夠對付法西斯份子，如果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只要“共產主義危險”存在一天就不可能“中立”法西斯份子，換句話說，如果在這個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中，這個階級的聯合干涉被人用抽象的、宗派主義的“原則”名義阻止的話——那末，將會有越來越少的機會，對這個日益（被資產階級國家機構所援助所唆使的、漸增地被大企業所資助的）法西斯主義恐怖，作出及時、堅決、有成功希望的反應。代替它的，將會是一連串的躊躇、迷失方向和士氣沮喪，最終導致失敗。這就是在德國發生的情況，儘管托洛茨基曾提出許多次的警告，儘管這些警告在托派之外的其他共產黨反對派份子中，例如在布蘭德勒和塔爾海默領導下的共產黨反對派和社工黨（一個從社會民主黨分裂出的左派），找到回聲。

法西斯主義與波拿巴主義

對瞭解法西斯主義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貢獻，是塔爾海默（August Thalheimer）的理論。這個理論導致與托洛茨基的結論相似的政治——策略結論。它可以非常簡單地總結如下：法西斯主義是反革命的最後階段，這個反革命是在1918/19年的德國革命失敗以後開始的，而且被定性為國家機構（行政部門）的日益增加的自主。他把這個自主定義為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那個“波拿巴主義”。<28>

塔爾海默的這個分析，包含一個真理的發端。國家機構在第三帝國中，在與國會、各政黨和各工會切斷任何關係的情況下，成為政治統治的一個組成元素，比在魏瑪共和國時代更是如此。但是在塔爾海默的理論中，卻不太注重各法西斯主義團體和往後法西斯機構（黨、黨衛軍等等）的角色。但這些卻是法西斯主義初次出現的形式。這就是法西斯主義與波拿巴主義所不同的特定種差（differentia specifica）。這個差別既不是偶然性，也不是次要的。它對法西斯主義的以下目標是非常緊要的：完全破壞任何形式的工人階級組織。單單是波拿巴主義的國家不能實現這個目標。它需要一個機構化的群體恐怖、集體控制的工具，警察或軍隊是不能提供這個工具的。這是法西斯主義群眾黨的任務。托洛茨基從開始就瞭解這點。因此，他反對波拿巴主義的解釋<29>，雖然他明顯地看出，波拿巴主義和

法西斯主義有某些共同點。

在布呂寧格、巴本和施萊克爾三人共同執政的後期的波拿巴主義之下，工人運動逐漸變弱，逐漸受到壓制。但是它仍然能夠採取抵抗的行動。從1933年1月30日到國會被焚燒之間的希特勒政府可被描述為一個“後波拿巴主義的”、半法西斯主義的政制。只有所有合法的工人組織完全被擊敗之後，我們可以說那個政權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獨裁制，不再是一個波拿巴主義的獨裁制。

這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爭論。這有極端實在的意義，那就是以群眾力量對法西斯主義進行抵抗的可能性。這樣一個可能性存在於波拿巴主義政權之下，但是在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下它就會快速地消失。<30>

這個分析性的、政治性的爭論在今天也是有相關性的。今天被許多左翼圈子所辯護的那個逐漸滋長的法西斯主義理論，正試圖用不適當的概念，幫助解釋一個非常真實的過程，那就是“強大國家”的發展，國家行政部門日益增加的自主性。自從第二次大戰以來，這個過程，這個發展，這個自主性，一直是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度的一個特徵。我們現在正在目睹的是，部分國家機構、高級將領、秘密警察、司法部門與包括公開的恐怖主義、鼓吹暴亂的團體在內的極端右翼團體等之間的日益增加的互依關係。<31>社會的某些部份，正對議會控制的這種減弱，如果不是正對議會控制的消除，越來越不關心，而且在許多情況中，甚至對“議會清談俱樂部”表示仇視。這種一般發展可被概念化為“逐漸滋長的波拿巴主義”。我們可以肯定地預測，在經濟、社會危機發生根本性的惡化之前，對民主自由的主要威脅，來自這個“逐漸滋長的波拿巴主義”，不是來自相對微弱的、公開的法西斯主義派系。這些法西斯主義團體正被部份國家機構利用，但是它們本身不是在幕後操縱的。

這段分析的結論是，我們今天所目睹的不是逐漸滋長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意義不止是國家機構日增的自主性。當法西斯暴徒開始真正地攻擊罷工和工會總部、威嚇、擊敗罷工中的工人的時候，我們所要對付的就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又從來不是逐漸滋長的，它總是公開的、野蠻的。

托洛茨基為主張聯合陣線所進行的鬥爭

托洛茨基在1930-33年時期對德國問題所作的煞費苦心的分析工作有一個直接的實際目標：向德國及國際的工人運動警告即將來臨的可怕威脅，提出及時克服這個威脅的策略和目標。他的中心思想可以總結在他的1931年12月8日的嚴正警告的話語中：

工人——共產黨員們，你們的人數以十

萬計、百萬計；你們不能到任何地方去，沒有那麼多的護照給你們。如果法西斯主義走上政權，它將會像一輛可怕的坦克，輾過你們的頭顱和骨骼。你們的解放在於發動無情的鬥爭，而且只有與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進行有戰鬥力的團結，才能帶來勝利。趕緊這樣做吧，工人——共產黨員們，你們的時間不多了！<32>

具體地說來，推動工人聯合陣線的正確策略必須包括以下各點：

- 拒絕接受“失敗主義”。只要工人群眾的動員在實際上是可能的，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就不會是必然的。
- 拒絕接受最後通牒。要求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與他們的黨及其領導決裂，不能夠成為聯合陣線的先決條件。應該向其領導有系統地提出組成聯合陣線的建議。聯合陣線應該是從上面及從下面而來的。<33>
- 拒絕接受議會呆小症。法西斯份子是否會奪取政權，不是選票來決定，而是在街頭、在議會之外的群眾鬥爭中決定的。
- 將力量集中在直接的反法西斯主義的行動上，以在各工人群眾組織的支持下動員廣大群眾為目的，達到武裝總罷工這個最終目標。

後來，那些對於造成1933年的慘敗分擔責任的人們曾聲稱，在1932年到1933年3月之間那段時期中，工人們，因被失業、分裂和士氣低落所磨滅，所以沒有準備要採取群眾行動來反對法西斯份子，可是，今天卻有大量的證據證明托洛茨基的觀點比這個為他們自己的被動、混亂和失敗而作的辯護現實得多了。<34>數以百萬計的德國工人要採取群眾行動的意志，比托洛茨基想像中認為的還要大。<35>今天在某些社會民主黨的圈子內，這點已被承認。<36>

在社會民主黨的許多主要的錯覺中，有一個錯覺，像斯大林主義過左派的宗派主義一樣，對德國工人運動在1933年之未經一戰即向法西斯投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錯覺就是，為了防止法西斯份子奪取政權，有需要將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中立化”。後來被納粹謀殺的那個不幸的希爾費丁（Rudolf Hilferding），在1920—21年之前曾是一位激進社會主義者、勞工運動理論家，以後卻變為社會民主主義右翼的主要理論家。當他在1933年寫出歷史將會認為社會民主主義阻止國家機構與納粹合作的成功是它的最大歷史成就的時候，他就最清楚地表達了上述的錯覺。

不幸的是，在希爾費丁這幾行字見報時，奧登堡已經提名希特勒為國務總理。<37>產生這個錯覺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沒有瞭解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性質，特別是它的軍事及國家機構的

性質<38>；其次是低估了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度，因為這個危機可以導致資產階級議會民主被消除。

工人聯合陣線與人民陣線

德國的慘敗，世界上最強大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之未經一戰即向敵人投降，給予德國及國際的工人階級的自信和階級自覺以毀滅性的打擊。這個失敗的負面結果，除了直接的經濟、政治的後果，還有其他方面。托洛茨基正確地預測了這一點，而且從1933年春天開始，試圖在發展的局勢中指導一小群追隨他的人們。

這個震動的第一個結果是一個無可抗拒的壓力，要求所有工人階級組織在德國以外的各個國家中組織聯合陣線，來反對法西斯主義或其他形式的反動獨裁制的危險。右翼份子於1934年2月6日在法國發動的攻勢，觸發了社會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實際聯合陣線，至少在那天之後的三年內，使法國社會的力量關係和動力完全倒轉了。工人階級的力量非常迅速地增長。最後，1936年6月的總罷工和佔領工廠，把法國帶到了社會主義的門檻上。<39>

同樣地在西班牙，1934年反動派的攻勢，引致了有一翼建基在神職人員、半法西斯主義的結構上的右翼政權。與法國的情況相似的是，西班牙反動派的這個攻擊，也觸發了強大的、聯合的工人階級的反應。工人階級的這個反應，首先表現在1934年10月的流產暴動上，其次表現在1936年上半年的群眾鬥爭連續不斷的興起上，最後表現在初期的社會主義革命上。這個社會主義革命是為了回應1936年7月的軍事——法西斯主義的政變，在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及重要的鄉村部份爆發出來的。但是在法國和西班牙這兩個情況中，工人階級的這個統一攻擊的巨大潛力，卻被轉向到完全與私有財產、資產階級國家的殘存相符的管道上。事實上，這就是社會民主黨、斯大林主義及工會的官僚們（在西班牙還包括無政府主義群眾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所自覺推行的階級合作政策。<40>

從1935年開始，共產國際在斯大林領導下全盤接受了與“自由”資產階級結成反對“反動勢力”的集團這個老的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的“較少邪惡”的策略。這個人民陣線政策，發生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和資產階級民主制正面臨深刻的、無法被各種各樣改革所緩和的結構性危機的同時，不但意味著工人們喪失了另一次奪取政權的歷史時機，這主要是由於斯大林主義的錯誤，正如1918—1923年時期由於社會民主黨的錯誤一樣。（同樣的經驗第三次在1944—48年時期發生在法國、意大利和希臘）。它也意味著工人運動在反動勢力的襲擊下的崩潰、法西斯主義只被推遲，沒有被避免。

在西班牙，在斯大林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在共和國的陣營中擊碎了社會革命之後，法西斯主義者終於在內戰中獲勝。在法國，工人階級力量的巨大集結，卻因連續幾個人民陣線政府的投降和工人階級接著而來的幻滅和沮喪而粉碎了。在1936年6月的榮耀總罷工之後的兩年多，就來了1938年9月的總罷工被打敗，接著當貝當元帥的衰老波拿巴政權於1940年在工人們沒有任何反應的情況下接管了政府的時候，就是工人階級的各種自由權利被削弱、共產黨被宣佈為非法、工會的癱瘓和第三共和國不光彩的自我毀滅。

決不偶然的是，托洛茨基在希特勒取得政權之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黨製造分裂政策的尖銳批評，今天在非常廣大的圈子中贏取了贊同和敬佩^{<41>}；然而他對人民陣線政策會產生悲慘後果的同樣有論據的證明，卻遇到敵友雙方的歷史學家和批評家們的大量誤解甚至反對。^{<42>}因為法西斯主義象徵著對於革命組織的生存、甚至是溫和的社會民主組織的生存的肉體威脅；它不但被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被大部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全部工人官僚層看成為野蠻的威脅。這些正是在頂層和底層推行聯合陣線政策的物質基礎。

可是人民陣線主義只不過是自從本世紀初以來被各改良主義工人領導、工人官僚層所實行的階級妥協、階級合作政策的一個變種而已。普遍地受到大多數知識份子的贊同。對他們來說，贊成托洛茨基對人民陣線主義的批評，即會意味著拒絕接受他們的往事，而且在許多場合會意味著直接反對他們自己眼前的物質利益。

可是，對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先進工人們而言，了解托洛茨基在1929—33年時期為推進德國的聯合陣線所進行的鬥爭和他在1935—38年時期在法國、西班牙反對人民陣線的鬥爭之間的邏輯關係，是至關重要的。法西斯主義之興起為對有組織工人運動的立即威脅，是與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深刻結構性危機同時發生，它本身是與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和資產階級社會的深刻結構性危機連在一起的。在這些情況下，以不惜任何代價保衛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來抵抗法西斯主義的危險，等於把一切賭注押在瀕臨死亡的這些機構的殘存上。雖然保衛工人階級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包括普選權在內的每一個戰利品以反對反動勢力是正確的，但是把這種保衛的範圍局限在狹窄、腐朽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機器的架構上，等於自殺。

如果不把因人成功地保衛工人階級的組織和自由而獲得的力量作為向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危機提供革命社會主義解決方法的跳板的話，那末，這力量就會快速地衰微和瓦解。法西斯主義或半法西斯主義的反動勢力，經過一段暫時的撤退以後，將會捲土重來，反對一個因其巨大戰鬥力量

沒有產生正面結果而被弄得士氣低落的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有極大危機的情況下，資產階級民主制是沒有前途的。它要麼被無產階級民主制所取代，要麼倒塌為右翼獨裁制。拒絕汲取那個教訓，已在西班牙（和以後的智利）導致與意大利、德國工人的不團結所引起的失敗同樣悲劇性、同樣代價高、同樣持久的失敗。

有些宗派主義者曾經企圖把人民陣線與工人的聯合陣線之間的差別簡化為是否有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人物或政黨參加聯合政府的問題。這種抽象的、圖式的處理問題的態度，事實上是與人民陣線支持者處理問題的態度十分相似的。後者把與自由資產階級政黨的聯盟看成為與中產階級聯盟的必要先決條件。宗派主義者把資產階級的政治人物之參加聯盟看成為走向階級背叛的必然的前奏。

雙方所忽視的是，真正有決定性的問題，即是反資本主義的群眾行動的自由獨立發展的問題。如果資產階級政治人物或政黨的參加，使這個群眾行動被減少或者被阻止——或者被利用來作為減少或阻止這個群眾行動藉口的話，那末我們所得到的是人民陣線，是無產階級放棄階級政治獨立性。但是，如果資產階級的政治人物或政黨之參加聯盟不制止發展中的反資產階級國家的攻勢，那末這些資產階級政治人物在客觀上就是工人階級的俘虜。

註釋：

<19> 見 Daniel Guérin 的《法西斯主義與大企業》（1973年紐約版），Franz Neumann 的《Behemoth》[《龐然大物》]（1942年多倫多版）。

<20> 奧斯蒂弗是1927年為了挽救無償債務能力的、主要是小型的農民們而發動的農業援助計劃。實際上，幾乎全部款項都被濫花在他們之中最大的地主們、（普魯士）貴族地主們（the Junkers）身上。奧登堡總統的兒子 Oscar 曾經是搞這些見不得人的交易的著名人物。這件事就被利用來獲得他與納粹合作，勸導他的父親任命希特勒為總理。

<21> 哈爾茨堡陣線（Harzburg Front）是納粹、胡根堡的保守黨和同樣保守的 Stahlhelm[鋼盔團]之間的一個集團。（鋼盔團是在 Franz Seldte 領導下於1918年成立的右翼準軍事退伍軍人組織。Franz Seldte 以後曾短期任希特勒治下的一個部長。）

<22> 1944年6月20日希特勒的一位早期支持者 Count von Stauffenberg [斯陶芬堡伯爵] 企圖暗殺他的日子。

<23> 見 Eberhard Czichon 的《Wer half Hitler zur macht?》[《誰幫助希特勒拿到政權?》]（1967年科隆版）。

（未完，下轉第26頁）

The Rationale of Hu Jintao's Rule is Tested

Zhang Kai

At the 82nd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u Jintao delivered a long speech in a symposium on *Theory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organized jointly by various central institutions. It was his first public speech after he became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CCP. The following article tries to examine the rational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the leadership of CCP.

In his verbose speech, Hu repeatedly applauded Jiang Zemin's *Theory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as a new achievement in Marxist development in China, led by CCP under Jiang's leadership.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party keeping in touch with the masses. He called upon officials to keep the safety and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in mind and wholeheartedly implement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to lift the needy out of difficulty. His speech was packed with glamorous rhetoric, but the question is how to put through those ideals and promises?

Hu expected that different levels of officials would actually implement the central policies. Did it mean that they had never carried out the policies? Would they take real actions just because of his recent appeal? Could the policies really get the laid-off workers and peasants out of poverty (particularly when high unemployment and rural poverty were mainly caused by the central policies)?

The answer is NO. Almost all officials lust for power and privileges. Hu urged leading cadres to build up proper values and to solve problems of conflicts of power and interests. It meant that he required them to change ideologically, but there were no actual policies of doing away with their institutional privileges. Thus, his speech was not only a useless *lesson*, but also an idealistic stuff.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aking all officials solve difficulties of the urban poor and peasants, there should b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tra-party democracy, and the abolishment of cadr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ivileges, and people would becom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nd redress the wrong national policies because of dictatorship of CCP.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reforms of democratization within and outside the party. According to *Apple Daily*, Hu Jintao once proposed for intra-party democracy in his draft speech which led to serious attacks from the conservative within the party. He then gave it up. If it were true, it meant that the conservative still got the upper hand. Since officials and cadres of different levels have long enjoy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ivileges, so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whole party to perform self-democratization. Even if Hu wanted to initiate

radical reforms to follow predecessors like Hu Yaobang and Zhao Ziyang, he was not powerful enough to challenge forces of existing institutions and bureaucracy. His speech without touching upon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 is proof.

Undoubtedly, Hu criticized that some cadres failed to resist temptations of materialism and extreme individualism, and there were also some phenomena of corruption. He just gave a very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phenomena, but as we all know it in fact happens everywhere. This only reveals that it is the natural consequence of corrupted bureaucracy with privileges.

In order to defend official system and cadres' privileges, China's media has long been controlled by CCP. As a result, at the outbreak of SARS in Guangzhou and Beijing, any news about SARS was blocked. The public (particularly Hong Kong) could not immediately take precautions, which led to lots of infections and deaths of the medical workers and people. Although Chinese government fired two high-ranking officers, there still emerged calls for lifting news blockade. Li Changchun, a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party's ideology and propaganda work, wrote an article in the periodical of *Qiu Shi*, dated 16 May, that propaganda should catch up with the reality and the masses. On the whole page of the feature titled *China's Media Brew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Wen Hui Bao*, dated 29 May, it stated that great changes were brewing in mass media. Later, on 28 June, it was reported that researches on cultural institutional reform had already been launched, which included ideology, propaganda, public opinions and others.

Meanwhile, many Chinese scholars and intellectuals have already demanded for various reforms. For example, in his paper published on the magazine of *Caijing*, Wu Jinlian, a well-known economist, pointed out that the crisis of SARS was a crisis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disclosed *the most serious weakness* of governmental management of crises. He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prompt reform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s soon after overcoming the crisis of SARS, and then to build up a government with openness,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same magazine, Zhou Ruijin, the former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People's Daily*, also wrote an article titled *Mass Media to Shoulder the Burden of Publicizing Information*, stating that mass media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of breaking news blockade and wrestling with unreasonable administrative hindrances.

There have been consistent calls for intra-party democracy. According to *Xuexi Newspaper*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dated 7 July, Yu Yunyao, the general deputy of the School and Hu Jintao's schoolmate at Qinghua University, said that a party could not be in power forever without any energetic forces. He thought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develop intra-party democracy, and to improve and reinforce democratic centralization. For the sake of protecting party members' rights,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the congress of delegates and the party committees.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reforming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 there should be intra-party democratic system representing fully the will of party members. Moreover, it was also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s on leaders, to reinforce intra-party system of supervisions, and to unite with others like the law, the masses, and public opinion.

In his speech, Hu issued a promise that the party would work hard for a long time to further develop the economy and to improve democracy. Actually, since there is completely no democracy in China, it is meaningless to talk of *a better democratic system*, and he even said it would come true only *after a long time*! If Hu's proposals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ll go into void, which inevitably will lead to loss of popular support, he cannot fight against the conservative in the party. It will turn out that he will become their puppet.

Nevertheless, on the eve of Hu's delivering a speech at the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CP,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ok further actions to regulate the media. There were two bans of *illegal*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ithin a week in Beijing. First, *Beijing New Daily*, belonging to *Workers' Daily*, was banned and its editorial board was also forced to dismiss, due to an article titled *Seven Signs of Disgust of China*, which was considered to have degraded the nation, insulted the authorities, and violated the rules of national news and publications. The article made a serious critique o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criticized that speeches of high-ranking cadres were always upheld as the golden rule. Another was the ban of the magazine of *Caijing*, published on 20 June, in which there were reports of Zhou Zhenyi's case and some papers of 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SARS.

These events happened even after Hu has become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CCP. It is a big slap in his statement of *further improving democracy*, particularly on the eve of delivering the 1st July speech.

July 2003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0卷 第2期 (總第213期)

2003年8月15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 〈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 9846 3428 傳真: 3494 1762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 (852) 9846 3428 Fax: (852) 3494 1762

E-mail Address: october_review@yahoo.com

Web Site: <http://www.octreview.org/>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香港	2	乘勝力爭普選特首和全部立法會議員.....	振 言
中國	4	胡錦濤的執政理念可經得起證驗？.....	張 開
	6	公安人員無法無天，導致法例更換.....	軍 行
	8	資本主義是否已在中國完全復辟？.....	兆立譯
國際	10	美國侵佔伊拉克惡化局勢.....	亞·托納特
	11	小泉政權的“司法改革”將剝奪市民訴訟權利.....	趙京譯
	11	菲律賓左派的發展.....	彼亞特·羅徹特
拉丁美洲特輯			
	12	拉美各國革命運動和左派的發展.....	尼·赫雷拉
	13	處於革命邊緣的委內瑞拉.....	G·傅利
	14	關於委內瑞拉的局勢.....	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
	15	烏拉圭的當前局勢——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切後果和出路都已經敞開了...左翼思潮派	
	16	厄瓜多爾軍人統治與階級鬥爭.....	社會民主思潮派
	17	巴西工人黨左翼的進展.....	丁·博格斯
	17	巴西有可能實現另一種經濟模式.....	社會主義民主派
	19	從歷史看阿根廷.....	蔚然輯譯
歷史	22	斯大林下令殺害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來論）.....	劉 丹
書評	25	《對抗經濟全球化的可能選擇》評介（來論）.....	趙 京
	27	《權力與貨幣》書評（來論）.....	劉 丹
特譯	29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十）.....	曼德爾
英譯	34	The rationale of Hu Jintao's rule is tested.....	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30 ISSUE 2 2003.8.15

HONG KONG

- 2 Fight for general elections of Chief Executive and Legislature..... Zhen Yan

CHINA

- 4 The rationale of Hu Jintao's rule is tested..... Zhang Kai
5 Police illegal behaviors led to legal change..... Jun Xing
8 Has Capitalism been restored in China?..... (tr) Zhao Li

INTERNATIONAL

- 10 US occupation turns sour..... Alan Thornett
11 Koizumi's juridical reform deprived of civil legal rights..... (tr) Zhao Jing
11 Development of the left in the Philippines..... P. Rousset

SPECIAL ON LATIN AMERICA

- 12 Latin America: between "Argentinazo and Lula effect"..... Ernesto Herrera
13 Venezuela: on the edge of revolution..... G. Foley
14 Venezuela: Declaration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United Secretariat of F.I.

- 15 Uruguay: "a period whose outcome is open"..... Left Current

- 16 Ecuador: the Caudillo and the class struggles..... Corriente Democracia Socialista

- 17 Brazil: Advance of the PT left..... J. Borges
17 Brazil: Another model is possible..... Democracy Socialist
19 Argentina in history..... (tr) Wei Ran

HISTORY

- 22 Stalin ordered to kill Trotsky and his comrades..... Liu Dan

BOOK REVIEW

- 25 *Alternatives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 Better World is Possible*..... Zhao Jing
27 E. Mandel: *Power and Money*..... Liu Dan

SPECIAL ARTICLE

- 29 Trotsky as alternative (chapter 7[b])..... E. Mandel

ARTICLE IN ENGLISH

- 34 The rationale of Hu Jintao's rule is tested..... Zhang Kai